

上海市律师协会
现代物流业务研究委员会
法讯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91 期

本期责任编辑：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胡小俐律师

©上海市律师协会现代物流业务研究委员会

目 录

一、法规政策	1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指导意见 进一步完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办理规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6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解读	16
二、热点关注	17
《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22 年）》解读	17
《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解读	20
长三角腹地解锁进出口新模式 联动接卸 抵港直装	24
三、行业动态	26
中国海事审判（2018—2021）全文.....	26
2022 年 12 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报告	49
民航局印发《航空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指南》	50
四、典型案例	52
2022 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52

一、法规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指导意见 进一步完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办理规范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3-01-31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系统总结了人民法院近年来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的经验，针对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对申请执行监督案件办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系列共性问题进行了规范和指引。

据了解，《意见》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改革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的要求，立足我国执行工作处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在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中的职能作用。

《意见》对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的立案受理问题进行了规范，对实务中当事人向执行法院及向上一级法院申请督促执行的适当途径，作出了指引和要求；针对应通过仲裁或实体诉讼途径解决的相关案件，明确指引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寻求实体争议救济程序解决，消除已有规范的模糊执行；对多次和重复申请执行监督问题进行了规范，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效率。

《意见》对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进行了规范，明确申请人对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及因超过提出执行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应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据介绍，这有利于维护执行秩序的稳定，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意见》在明确申请执行监督的一般性规定和途径的同时，参照人民法院四级

法院职能定位的改革精神，进一步厘清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的范围，明确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条件，全面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在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中的职能作用。

《意见》还补充规定了三种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结案方式，并对结案文书的要求进行了规范指引。（记者 孙 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23〕4 号

为进一步完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办理程序，推动法律正确统一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的要求，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立案，但法律、司法解释或者本意见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依法应当提出执行异议而未提出，直接向异议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异议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申请人依法应当申请复议而未申请，直接向复议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复议法院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

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申诉信访过程中，发现信访诉求符合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按照前两款规定处理。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认为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执行措施而未采取，向执行法院请求采取执行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处理，一般不立执行异议案件。

执行法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执行，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责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立案办理。

第三条 当事人对执行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或者申请执行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向其释明法律规定或者法定救济途径，一般不作为执行复议或者执行监督案件受理：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异议裁定不服，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处理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的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

（三）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可以重新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五）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不通过执行复议程序进行救济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针对人民法院就复议裁定作出的执行监督裁定提出执行监督申请的；

（二）在人民检察院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后又提出执行监督申请的。

前款第一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而作出执行监督裁定的除外。

第五条 申请人对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应当在执行复议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申请人因超过提出执行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应当在提出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申请人超过上述期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终结审查。

第六条 申请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的，应当向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申请人对执行复议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审查程序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有错误的；

（二）执行复议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第七条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执行监督申请书除依法必须载明的事项外，还应当声明对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适用的审查程序没有异议，同时载明案件所涉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焦点、论证裁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理由和依据。

申请人提交的执行监督申请书不符合前款规定要求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一次性全面告知其在十日内予以补正；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予补正的，按撤回监督申请处理。

第八条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立执行监督案件：

（一）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不同高级人民法院之间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截至案件审查时仍未解决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立执行监督案件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且符合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立案监督。

第九条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的执行监督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由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一）案件可能存在基本事实不清、审查程序违法、遗漏异议请求情形的；

（二）原执行复议裁定适用法律可能存在错误，但不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

第十条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符合本意见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之一，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的，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前款规定提出的报请后，认为有必要由本院审查的，应当立案审查；认为没有必要的，不予立案，并决定交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执行监督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由本院或者作出执行复议裁定的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原审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执行监督申请书和相关材料交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结案方式外，执行监督案件还可采用以下方式结案：

（一）撤销执行异议裁定和执行复议裁定，发回异议法院重新审查；或者撤销执行复议裁定，发回复议法院重新审查；

（二）按撤回执行监督申请处理；

（三）终结审查。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查执行监督案件，一般应当作出执行裁定，但不支持申诉请求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驳回通知书。

第十四条 本意见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本意见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之前有关意见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于本意见施行之前受理的申请执行监督案件，施行当日尚未审查完毕的，应当继续审查处理。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7 号)

来源：交通运输部 发布时间：2022-11-03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经第 25 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2 年 11 月 3 日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铁路旅客运输正常秩序，规范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行为，保护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合法权益，完善公平公正的旅客运输市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铁路旅客运输。

第三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程制定旅客运输相关办法，包括购票、退票、改签，旅客乘车、随身携带物品和托运行李相关规定等事项，并在实施前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车票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凭证，可以采用纸质形式或者电子数据形式，一般应当载明发站、到站、车次、车厢号、席别、席位号、票价、开车时间等主要信息。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方便快捷的票务服务，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设施，文明礼貌地为旅客服务，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车票载明的到站。

第六条 旅客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铁路运输安全规定，配合铁路工作人员的引导，爱护铁路设备设施，不得扰乱铁路运输秩序。

第七条 旅客享有自主选择旅客运输服务和公平交易的权利。铁路运输企业不得限定、强制旅客使用某项服务或者搭售商品。

第八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公布车站运营时间、停止检票时间、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旅客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物品目录等信息。

第三章 车票销售

第九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规定，实施车票实名制管理。

第十条 购票人应当向铁路运输企业提供乘车人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

铁路运输企业对车票销售过程中知悉的旅客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十一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公平销售车票，保留人工售票服务。鼓励铁路运输企业为旅客提供互联网、自动售票机等多种售票渠道，为旅客购票、取票、退票、改签等提供便利。

鼓励铁路运输企业开办定期票、计次票、联程票、乘车卡等业务，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第十二条 除需要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实行车票实名制情况下未满 14 周岁或者未实行车票实名制情况下身高不足 1.5 米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

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年满 6 周岁且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 周岁的儿童，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 6 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身高 1.2 米且不足 1.5 米的儿童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身高达到 1.5 米的儿童，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身高未达到 1.2 米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席别应当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按上述规定享受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占用席位时，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第十三条 旅客携带免费乘车儿童时，应当提前告知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免费乘车儿童出具乘车凭证。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免费乘车儿童检票和乘车时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第十四条 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含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审批设置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军事院校，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有实施学历教育资格的公办、民办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就

读的学生、研究生，凭学生证（中、小学生凭盖有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每学年可以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实习地点）所在地之间四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以购买一次学生优惠票。学生优惠票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席或者动车组列车二等座。

学生证应当附有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优惠乘车凭证，优惠乘车凭证需要载明学生照片、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优惠乘车区间、院校公章等信息。学生证优惠乘车区间的记录、变更需要加盖院校公章。

华侨学生、港澳台学生的优惠乘车区间为口岸车站至学校所在地车站。

第十五条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人员凭证可以购买优待票。

第十六条 旅客丢失实名制车票后，可以向铁路运输企业申请办理车票挂失补办手续，铁路运输企业不得重复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费用。

旅客丢失非实名制车票应当另行购票乘车。

第四章 乘 车

第十七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等规定，对旅客及其随身携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物品应当遵守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运输的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明确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的相关规定，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 （一）随身携带物品总重量限额；
- （二）每件物品的重量及尺寸限定；
- （三）免费携带物品的重量；
- （四）超限携带物品计费标准；
- （五）特殊携带物品的相关规定；

（六）因铁路运输企业责任导致携带物品损坏、丢失的赔偿标准或者所适用的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车站、旅客列车等公共场所设置安全标志、导向系统和信息服务系统等设备设施。

第二十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运输旅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载明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乘车。

第二十一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规定，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遗属，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与其随同出行的家属提供优先购票、优先乘车等服务。

第二十二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老幼病残孕旅客提供优先购票、优先乘车等服务，为老年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必要的人工服务。

视力残疾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

第二十三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齐全、干净、整洁的服务备品。车站、旅客列车等公共场所应当内外整洁、空气清新。

第二十四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餐饮服务，不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and 不合格产品。车站内和列车上提供的商品及服务应当做到明码标价、质价相符、信息描述规范。

第二十五条 旅客应当接受铁路运输企业对乘车相关凭证进行的必要核验。

购买优惠票、优待票的旅客需要凭相应证件乘车。

第二十六条 铁路运输企业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补收票款：

- （一）主动补票或者经车站、旅客列车同意上车补票的；
- （二）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而未买票乘车的；
- （三）应当购买全价票而使用儿童优惠票乘车的。

需要收取手续费的，按照有关铁路旅客运输杂费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未经铁路运输企业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补收票款，可以加收 50% 已乘区间应补票款：

- （一）无票乘车未主动补票的；

- (二) 在车票到站不下车，且继续乘车的；
- (三) 持低等级席位的车票乘坐高等级席位的；
- (四) 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优待车票乘车的。

需要收取手续费的，按照有关铁路旅客运输杂费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铁路运输企业发现变造、伪造车票或者证件乘车，霸座或者其他扰乱秩序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九条 对下列旅客，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拒绝运输：

- (一) 有本规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拒不支付应补票款、加收票款的；
- (二) 不接受安全检查和安检的；
- (三) 购买实名制车票但不接受身份信息核验，或者车票所记载身份信息与所持身份证件或者真实身份不符的；
- (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传染病防治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实施隔离管理的；
- (五) 扰乱车站、列车秩序，严重精神障碍和醉酒等有可能危及列车安全或者其他旅客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
- (六) 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况。

旅客不听从铁路运输企业工作人员劝阻，坚持携带或者夹带危险物品或者违禁物品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拒绝运输。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五章 车票改签与退票

第三十条 因旅客自身原因不能按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乘车，或者按照本规程规定被拒绝运输时，旅客要求办理退票或者改签的，应当按照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的约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因铁路运输企业原因或者自然灾害等其他不能正常运输情形导致旅客不能按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席位号乘车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旅客的要求

办理退票或者改由其他车次或者席位运送旅客。重新安排的席位票价高于原票价时，超过部分不予补收；低于原票价时，应当退还票价差额。

对前款规定的情形，铁路运输企业不得收取退票费。

第三十二条 旅客办理退票、申请退款后，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退款手续，上述时间不含金融机构处理时间和旅客自身原因导致的时间延误。

第六章 行李运输

第三十三条 行李票是铁路行李运输合同的凭证，应当载明车票票号、发站、到站、包装、件数、重量、费用、承运时间及旅客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等主要信息。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三十四条 旅客凭有效车票、身份证件可以在行李办理站间托运行李，行李票和车票的发到城市应当保持一致。

第三十五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明确旅客托运行李的相关规定，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 （一）托运行李总重量限额；
- （二）每件行李的重量及尺寸限定；
- （三）超限行李计费方式；
- （四）是否提供声明价值服务，或者为旅客办理行李声明价值的相关约定；
- （五）特殊行李运输的相关规定；
- （六）行李损坏、丢失、延误的赔偿标准或者所适用的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等规定，对旅客托运的行李进行安全检查。旅客托运行李应当遵守国家禁止运输或者限制运输的相关规定，不得夹带货币、珍贵文物、金银珠宝、档案材料、证书证件等贵重物品。

铁路运输企业在承运行李时或者运输过程中，发现行李中装有不得作为行李运输的任何物品，应当拒绝承运或者终止运输，并通知旅客处理。

第三十七条 行李的包装应当完整牢固、适合运输，包装材料和方式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装标准和条件。

第三十八条 行李应当随旅客所乘列车或者就近列车运送，如遇特殊情况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向旅客作出说明。

第三十九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旅客办理行李托运变更手续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十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及时通知旅客领取到达的行李。

行李从运到日起，铁路运输企业应当至少免费保管 3 日；逾期到达的行李应当至少免费保管 10 日。因行李损失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应当适当增加免费保管日数。

对前款规定的时限，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十一条 在行李运输过程中，行李发生损坏、丢失或者延误，旅客要求出具行李运输损失凭证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及时提供。

第七章 应急处置

第四十二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自然灾害、恶劣天气、设备设施故障以及安全事故等对旅客出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依法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物品，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四十三条 线路中断、列车不能继续运行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妥善安排受阻旅客，并及时公告铁路旅客运输相关业务停办、恢复等信息。

因线路中断影响旅行，旅客要求出具证明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及时提供。

第四十四条 线路中断后，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妥善保管承运的行李，并及时通知旅客，与旅客协商处理方案。

第四十五条 发生旅客急病、分娩、遇险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当积极采取救助措施并做好记录。

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侦查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协助收集相关证据、调查事件发生原因。

第四十六条 铁路运输企业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章 旅客投诉与建议

第四十七条 旅客有权就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问题向铁路运输企业投诉,也可以向铁路监管部门投诉。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建立旅客运输投诉处理机制,设立电话、网络、信件等投诉渠道并对外公布,配备必要的投诉处理人员并保证投诉渠道畅通,运行良好。

第四十八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收到旅客投诉后 3 个工作日内答复受理情况,10 个工作日内告知实质性处理结果;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记录旅客的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投诉记录至少保存 3 年。

第四十九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认真研究旅客提出的服务改进意见建议,必要时主动沟通并作出答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铁路营业站及营业线的启用、封闭和业务范围的变更,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公告。

第五十一条 铁路运输企业利用旅客列车办理包裹运输业务的,参照本规程行李运输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规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解读

来源:交通运输部法制司 发布时间:2022-11-17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7 号,以下简称《客规》),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便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本规章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原《客规》(铁运〔1997〕101 号)是原铁道部规范性文件,在铁路政企合一管理体制下制定,既有行政管理内容,也包括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的民事关系,还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事项。近年来,铁路政企分开改革持续深入推进,铁路营业里程不断增加,高速铁路快速发

展，铁路旅客运输领域发生巨大变化，铁路运输企业不断突破传统客运服务形式，实现服务、经营创新。原《客规》的部分内容已经与铁路政企分开改革新要求不匹配，与铁路旅客运输实际不相符，还有不少内容滞后、缺失，需要调整或者补充。为了更好适应铁路改革发展新形势新要求，规范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行为，保护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修订完善《客规》并上升为部门规章。

二、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客规》共 9 章 52 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了对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的总体要求。一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的义务。包括制定旅客运输相关办法并向社会公布，为旅客提供安全、方便、快捷、文明礼貌服务，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设施，公布车站运营时间、停止检票时间、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等旅客服务重要信息。二是规定了旅客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包括自主选择旅客运输服务和公平交易，爱护铁路设备设施，不得扰乱铁路运输秩序。

（二）围绕票务重点环节，切实保障旅客运输安全和合法权益。一是聚焦社会关注的儿童票销售标准，区分车票实名制和非实名制的情形，分别按照年龄和身高销售儿童票，切实为儿童购票乘车提供优惠、便利。二是对学生、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等群体实行优惠（待）票。三是针对改签和退票环节，明确了各情形下的改签和退票原则性要求，并明确了退款期限，确保最大程度保护旅客合法权益。四是与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相衔接，明确车票实名制管理，切实维护铁路旅客运输秩序和安全。

（三）优化旅客的乘车和行李运输环节体验，保障旅客高效出行、便捷出行、安全出行。一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在车站和旅客列车配备服务设施设备的责任和义务，为旅客乘车提供最大便利。二是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要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士遗属、老幼病残孕旅客等提供优先购票、优先乘车等服务，健全特殊旅客权益保障。三是要求铁路运输企业针对旅客出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为旅客突发疾病等情形采取救助措施，切实保护旅客生命健康。四是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明确旅客随身携带物品和托运行李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旅客也应当遵守国家禁限运的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出行安全。五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拒绝运输及补收票款的情形，既便于企业按规定操作，又保护旅客合法权益，维护铁路运输秩序。

（四）畅通旅客维权渠道，切实维护旅客合法权益。一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明确旅客有权就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问题向铁路运输企业投诉，铁路运输企业要保证投诉渠道畅通，认真研究旅客意见建议。二是规范投诉处理时限，健全投诉沟通机制，提高旅客投诉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解读

来源：交通运输部法制司 发布时间：2022-11-17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7 号，以下简称《客规》），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便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本规章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原《客规》（铁运〔1997〕101 号）是原铁道部规范性文件，在铁路政企合一管理体制下制定，既有行政管理内容，也包括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的民事关系，还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事项。近年来，铁路政企分开改革持续深入推进，铁路营业里程不断增加，高速铁路快速发展，铁路旅客运输领域发生巨大变化，铁路运输企业不断突破传统客运服务形式，实现服务、经营创新。原《客规》的部分内容已经与铁路政企分开改革新要求不匹配，与铁路旅客运输实际不相符，还有不少内容滞后、缺失，需要调整或者补充。为了更好适应铁路改革发展新形势新要求，规范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行为，保护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修订完善《客规》并上升为部门规章。

二、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客规》共 9 章 52 条，主要包括：

（一）明确了对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的总体要求。一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的义务。包括制定旅客运输相关办法并向社会公布，为旅客提供安全、方便、快捷、文明礼貌服务，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设施，公布车站运营时间、停止检票时间、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等旅客服务重要信息。二是规定了旅客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包括自主选择旅客运输服务和公平交易，爱护铁路设备设施，不得扰乱铁路运输秩序。

（二）围绕票务重点环节，切实保障旅客运输安全和合法权益。一是聚焦社会关注的儿童票销售标准，区分车票实名制和非实名制的情形，分别按照年龄和身高销售儿童票，切实为儿童购票乘车提供优惠、便利。二是对学生、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等群体实行优惠（待）票。三是针对改签和退票环节，明确了各情形下的改签和退票原则性要求，并明确了退款期限，确保最大程度保护旅客合法权益。四是与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相衔接，明确车票实名制管理，切实维护铁路旅客运输秩序和安全。

（三）优化旅客的乘车和行李运输环节体验，保障旅客高效出行、便捷出行、安全出行。一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在车站和旅客列车配备服务设施设备的责任和义务，为旅客乘车提供最大便利。二是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要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士遗属、老幼病残孕旅客等提供优先购票、优先乘车等服务，健全特殊旅客权益保障。三是要求铁路运输企业针对旅客出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为旅客突发疾病等情形采取救助措施，切实保护旅客生命健康。四是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明确旅客随身携带物品和托运行李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旅客也应当遵守国家禁限运的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出行安全。五是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拒绝运输及补收票款的情形，既便于企业按规定操作，又保护旅客合法权益，维护铁路运输秩序。

（四）畅通旅客维权渠道，切实维护旅客合法权益。一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明确旅客有权就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问题向铁路运输企业投诉，铁路运输企业要保证投诉渠道畅通，认真研究旅客意见建议。二是规范投诉处理时限，健全投诉沟通机制，提高旅客投诉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二、热点关注

《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22 年）》解读

来源：交通运输部科技司 发布时间：2023-01-03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22 年）》（交办科技〔2022〕82 号），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平安交通建设是交通运输行业实施安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对于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交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016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16 年）》，有力推动了公路水运领域 160 项安全应急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截至目前，已编制并发布 70 项新制定标准、49 项修订标准，正在制修订 41 项标准，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供给速度显著提升，为“十三五”时期平安交通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以及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十四五”规划》《关于加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等对交通运输安全应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并明确“健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法规和标准规范”。《交通运输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在基础设施安全技术、安全生产预防控制、自然灾害交通防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强化标准供给，提升交通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增强安全应急救援和保障能力。因此，需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架构，明确标准需求，以科学系统地指导“十四五”期综合交通运输和公路、水运领域安全应急标准制修订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新形势下行业安全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及相关重点任务安排，系统规划新形势下行业安全应急标准制修订任务，交通运输部组织相关单位深入分析行业安全应急标准制修订需求，经过多方调研论证，研究编制了《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22 年）》。

二、编制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全面对接推进交通运输安全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优化完善标准体系架构，充分发挥标准对安全生产、应急保障的基础支撑作用。

坚持突出重点。围绕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重点任务，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坚持协调衔接。注重与国家和行业安全应急相关政策法规要求以及现行有效标准充分协调衔接，形成标准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坚持创新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进程，促进安全应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标准的有效供给，保持标准体系建设的适度领先。

三、体系范围及主要内容

《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2022 年）》范围主要包括综合交通运输和公路、水运领域与安全应急发展直接相关的技术、产品、服务和管理类标准。

标准体系包括基础通用标准、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标准、旅客运输安全标准、货物运输安全标准、应急管理标准、设施设备标准 6 个部分。其中，基础通用标准包括术语、分类与代码两个方面；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标准包括勘察设计安全、建设施工安全、运营养护安全三个方面；旅客运输安全标准包括公路客运安全、水路客运安全、城市客运安全三个方面；货物运输安全标准包括公路货运安全、水路货运安全两个方面；应急管理标准包括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事故调查四个方面；设施设备标准包括安全标志标识、防护设施设备、应急设施设备三个方面。

标准体系共收录 383 项交通运输安全应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包括基础通用标准 11 项，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标准 79 项，旅客运输安全标准 31 项，货物运输安全标准 105 项，应急管理标准 90 项，设施设备标准 67 项。其中，待制定标准 110 项，待修订标准 41 项，包括了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工程施工安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应急资源配置管理等重点标准需求。此外，标准体系还列出了与交通运输安全应急相关的国家标准、建筑工程行业标准、安全行业标准和水利行业标准 20 项，以促进安全应急标准的协同实施。

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标准体系的修订实施将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旅客运输安全、货物运输安全、应急管理及设施设备标准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提升安全应急管理标准化水平，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解读

——访部水运局副局长杨华雄

来源：交通运输部 发布时间：2023-12-31

主题：《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解读

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09:30

嘉宾：交通运输部部水运局副局长

杨华雄简介：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为船员、船舶提供安全、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了《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本期访谈邀请部水运局杨华雄副局长解读《指南》。

【主持人】 2022-12-30 09:3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在线访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为船员、船舶提供安全、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根据 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有关工作部署，交通运输部组织交科院、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了《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本期访谈我们邀请到部水运局杨华雄副局长解读《指南》。欢迎您，杨副局长。

【杨华雄】 2022-12-30 09:3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2022-12-30 09:32

杨副局长，请您介绍一下《指南》的出台背景和意义。

【杨华雄】 2022-12-30 09:33

内河水上服务区可为船员、船舶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供水等服务，受到了船民广泛欢迎。但目前还存在部分水上服务区服务内容较少、水平参差不齐和质量不高等问题。部党组高度重

视，将“推进内河重要干线水上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列入 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要求研究出台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为抓好贯彻落实，我局于年初组织部交科院等单位启动指南起草工作，先后开展了 4 次线上调研，赴重庆、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9 个内河水上门服务区开展了现场调研，多次与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服务区运行单位等进行座谈，面向服务区运行单位、航运企业、船员开展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召开了 2 次专家咨询会。我局还书面征求了海事部门和相关省厅、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意见，组织开展专家咨询听取了相关专家、公路学会等单位意见，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审定后，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内河水上门服务区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交办水函〔2022〕1717 号）发布。

【主持人】 2022-12-30 09:36

杨副局长，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内河水上门服务区发展的总体情况。

【杨华雄】 2022-12-30 09:37

伴随着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船员和船舶对生产、生活物资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内河水上门服务区快速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到 2021 年底全国有 58 个建成运行的内河水上门服务区；在 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工作的推动下，又有 11 个内河水上门服务区新建成，19 个在推进建设相关工作，18 个完成了功能拓展或升级改造，初步形成了内河水上门服务区体系，覆盖了长江干线、京杭运河、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等内河重要航道。

【主持人】 2022-12-30 09:39

杨副局长，请您具体讲讲《指南》如何考虑内河水上门服务区监管这个问题。

【杨华雄】 2022-12-30 09:40

内河水上门服务区是为船员、船舶提供多种服务的一个场所，建设、运行主体多元。内河水上门服务区的相关业务涉及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如交通运输、商务、食品安全监管、药监等部门。因此，《指南》提出，内河水上门服务区运行单位的服务行为应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依法依规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监管。

目前，江苏、浙江的内河水上门服务区大多由地方航道（水运、港航）事务（管理、发展）中心等单位负责运行，江苏部分地市人民政府还通过“三定”明确了港航事业单位负责内河水上门服务区运行的指导协调和具体运行等工作。但由于内河水上门服务区相关业务涉及多部门的特

点,《指南》提出,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动,发现涉及其他业务违规行为的,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

对于长江干线上的水上服务区,长江航务管理局系统、相关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协调推动工作,并对涉及交通运输行业的业务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因此,《指南》提出长江航务管理局会同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长江干线水上服务区涉及交通运输行业业务的监督管理。按照珠江航务管理局的职责,《指南》明确珠江航务管理局协同相关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西江航运干线水上服务区服务行为涉及交通运输行业业务的监督管理。

【主持人】 2022-12-30 09:46

杨副局长,我们注意到,《指南》对运行单位提出了要求,基于什么考虑,都有什么具体内容呢?

【杨华雄】 2022-12-30 09:47

运行单位是承担内河水上海上服务区日常运行和维护的单位。《指南》明确运行单位应建立运行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安全管理方面,运行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在运行管理方面,运行单位对经营性业务要做到证照齐全、诚信公平;对员工要进行岗位培训,提升员工职业素养、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对内河水上海上服务区服务要体现节能环保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要求;对船员、船舶要提供服务手册,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以及投诉处理等信息。

考虑到内河水上海上服务区运行主体多元化,对于采用租赁、对外承包经营方式的服务项目、场所或设备,运行单位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运行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主持人】 2022-12-30 09:53

杨副局长,《指南》发布的主要目的,是为船员、船舶提供良好的规范化服务,核心是围绕“服务”二字,对于服务要求有什么考虑?

【杨华雄】 2022-12-30 09:54

正如你所说,《指南》发布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水上服务区发展和服务提升,为船员、船舶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服务要求上则聚焦于服务信息发布、服务流程、服务内容等方面。

在服务信息发布上,《指南》明确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运行单位应通过网站、电子航道图、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外提供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名称和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考虑到长江航务管理局职能,长江干线水上服务区相关信息由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提供。

在服务流程上,《指南》鼓励运行单位通过网站、电话等方式,接受船方服务预约,约定服务位置、服务时间、服务事项等,告知进出服务区注意事项,并做好预约记录和登临服务区人员信息登记。

在服务内容上,考虑到目前我国各地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服务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处于刚起步阶段,不同地区的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服务差异较大。《指南》提出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可结合功能定位和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相关服务,并针对主要的 3 类 15 项服务提出了要求。立足“保基本、促提升”的思路,提出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必须具备生活物资补给、船舶供水服务,对于离岸布置的趸船或固定平台式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船员有上岸需求的应提供水上交通服务。顺应绿色、环保发展要求,鼓励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提供岸电服务、船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接收服务。同时鼓励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不断增加服务项目,优化服务模式,以达到引导提供高品质服务的效果。

【主持人】 2022-12-30 10:02

请您具体讲讲下步如何抓好《指南》落实。

【杨华雄】 2022-12-30 10:03

下一阶段,希望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充分认识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服务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督促相关单位落实责任,指导运行单位以实施《指南》为契机,推动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建设、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为船员、船舶提供安全、便捷、高效、优质服务。

【主持人】 2022-12-30 10:05

杨副局长,还有一位网友问:内河水上海务服务区服务船员情况怎么样?船员的反响如何?

【杨华雄】

2022-12-30 10:06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截至 12 月上旬，我国现有运行的内河水服务区，2022 年已完成服务船员 126.91 万人次。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推进内河重要干线水上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开展过程中，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办实事、利船员，切实提升船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积极听取船员意见，通过推进内河水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努力提升内河水服务区服务质量，不断满足船员生产生活的需求，解决好船员工作生活的难点和痛点，努力将内河水服务区打造成为广大船员辛苦旅途中的温馨“港湾”，受到了船员们的广泛好评。

【主持人】

2022-12-30 10:09

感谢杨副局长的解读。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访谈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关注。

【杨华雄】

2022-12-30 10:10

谢谢大家，再见！

长三角腹地解锁进出口新模式 联动接卸 抵港直装

来源：中国交通报

发布时间：2023-02-01

春节期间，上海港洋山港区异常忙碌，不时有远洋巨轮靠泊、起航。万吨巨轮旁，吨位不大的内河运输船同样繁忙地装卸。这得益于从 2020 年年底启动、2021 年开始在长三角推广复制、2022 年规模应用的“联动接卸”新模式。在此模式下，长三角腹地港口与上海港洋山港区紧密联结，实现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在“联动接卸”前，长三角腹地常选择以成本较高的陆路运输方式，将出口货物运至上海，直接从上海报关出口。“联动接卸”模式是上海及周边港口与海关联手推出的政策组合拳——外地港口相关进口货物可在洋山港区办理进口放行手续，经专用驳船转运至外地港口后直接提

离；出口货物在外地港口办理报关手续后，经专用驳船运抵洋山港区后，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一举解决了货物转关申报等问题。

至 2022 年年底，“联动接卸”模式已覆盖长三角 12 个港口。2022 年，上海与长三角其他省份经此模式共完成进出口货物 34.3 万标箱。据测算，每个进口和出口集装箱分别可降低物流成本 200 元和 400 元，进口货物自洋山港区运至安徽芜湖港，平均用时仅 48 小时。

上海港码头作业新模式不止“联动接卸”。全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2022 年汽车出口达 101.5 万辆，是 2019 年的 4 倍。面对前所未见且持续的出口高峰，海通码头解锁了“抵港直装”模式。

据介绍，传统汽车出口需要在码头提前堆存，并经多次装卸。得益于上海海关开展的进口“船边直提”、出口“抵港直装”操作模式，若车辆未命中出口查验指令，企业可申请“抵港直装”无干预通关，装船时长由过去 1 至 2 天压缩到 3 至 5 小时，从工厂下线的整车得以快速直抵码头登船。2022 年，上海港共开展出口“抵港直装”9.66 万标箱。

三、行业动态

中国海事审判（2018—2021）全文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2-12-12

前 言

蓝色而广阔的海洋承载着人类长久的梦想。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海事审判依法保障海洋强国建设，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肩负重要责任。

自海事法院设立以来，中国海事审判日益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亚太海事司法中心，正向着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标迈进。

2018 年到 2021 年期间，全球贸易局势复杂多变，世界航运经济波动加剧，世纪疫情影响深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服务和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海事审判向着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标，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在蓝天碧海之间书写新的篇章。

一、全国海事审判与执行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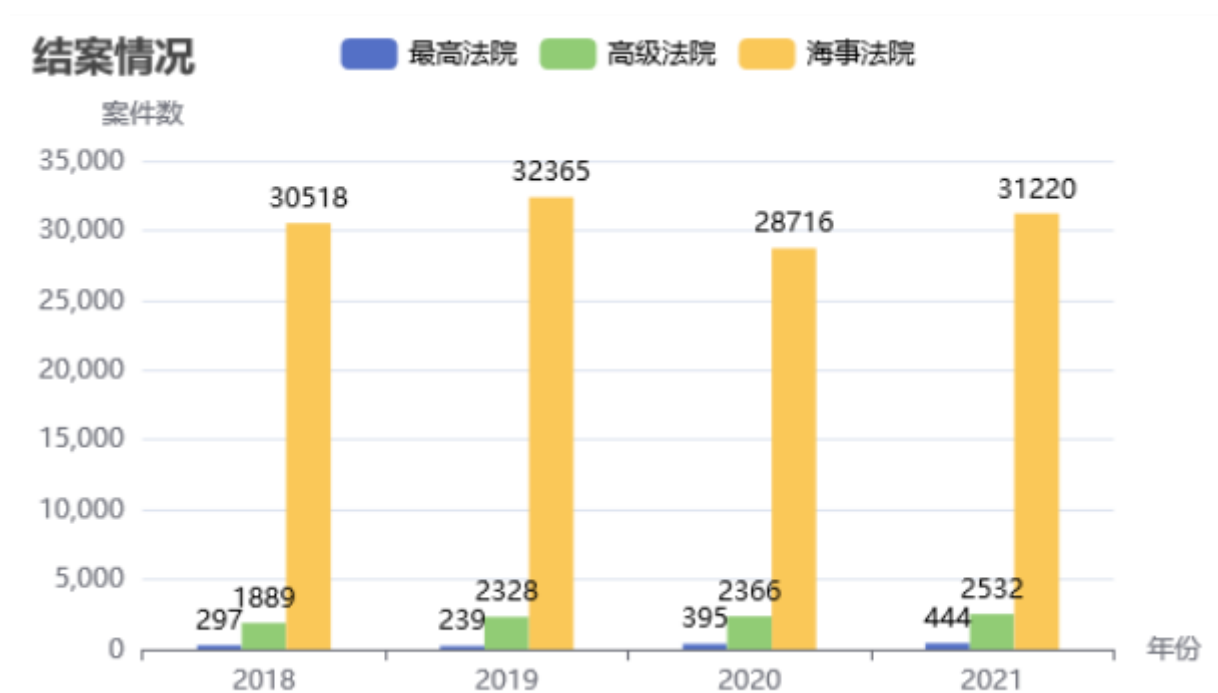
（一）总体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受理各类海事海商、海事行政、海事刑事以及海事执行案件 132633 件，审执结 133309 件。

附表一：2018-2021 年全国海事审判与执行收案一览表



附表二：2018-2021 年全国海事审判与执行结案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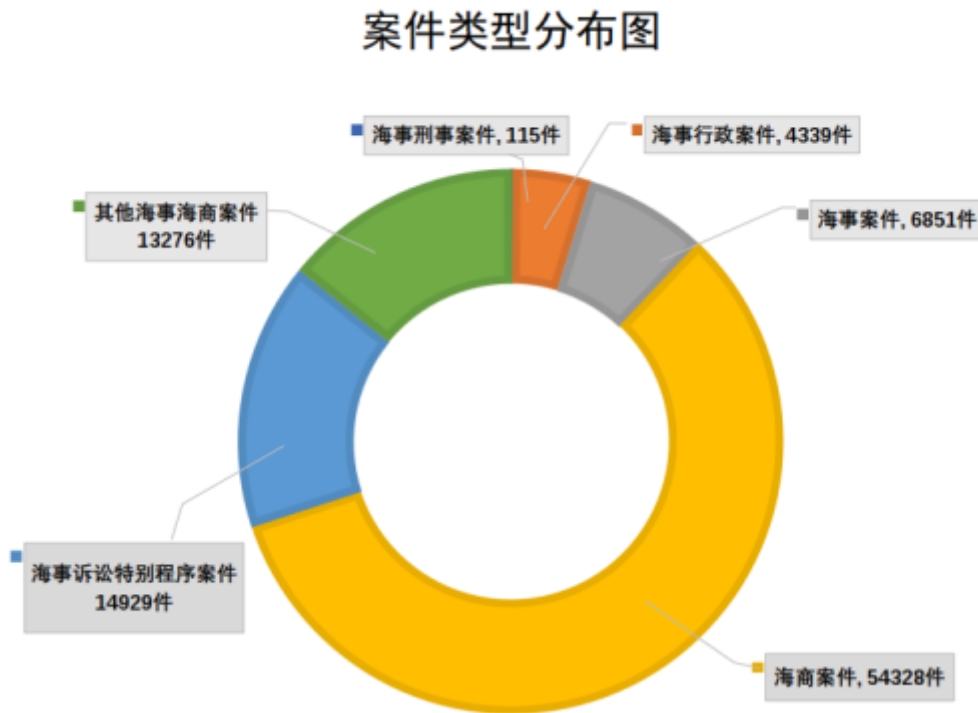


（二）各类海事案件概况

2018 年至 2021 年，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受理海事海商案件 89384 件，结案 88764 件（海商案件占比 60.78%，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案件占比 16.7%，海事案件占比 7.67%，其他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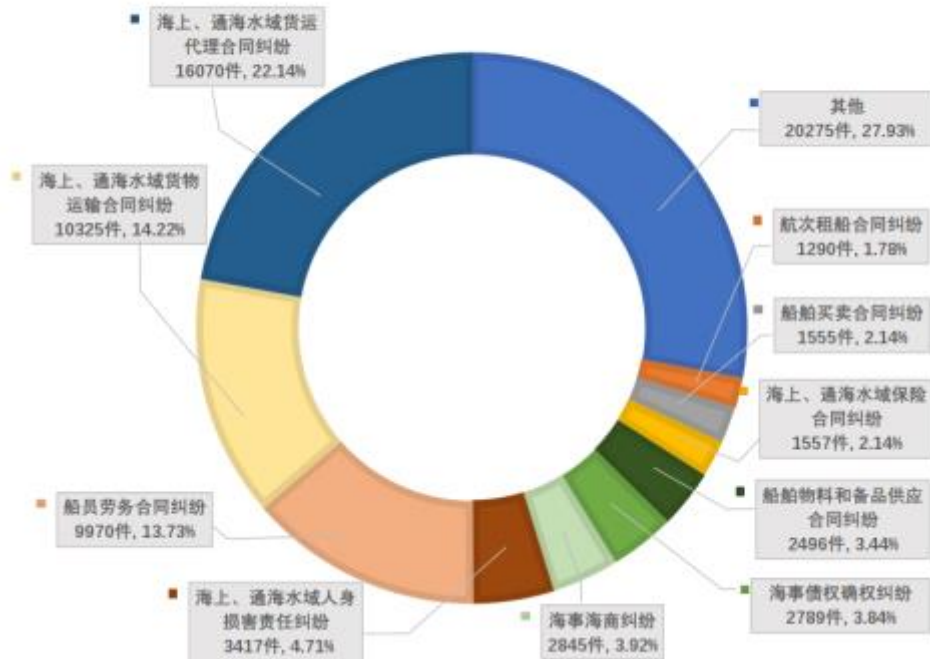
海商案件占比 14.85%)；受理海事行政案件 4339 件，结案 4227 件。海事法院试点受理海事刑事案件 45 件（不含指定管辖案件、请示案件），其中宁波海事法院 41 件，海口海事法院 4 件。

附表三：2018—2021 年全国海事案件类型分布图



附表四：2018—2021 年全国海事案件案由分布图

案件案由分布图



(三) 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共受理涉外案件 10397 件、涉港澳台案件 2693 件；审结涉外案件 10611 件、涉港澳台案件 2782 件。其中十一家海事法院一审新收涉外案件 9226 件、涉港澳台案件 1410 件；审结涉外案件 9437 件、涉港澳台案件 1435 件。案件涉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涉国家数量排名前五的有巴哈马、美国、新加坡、德国、丹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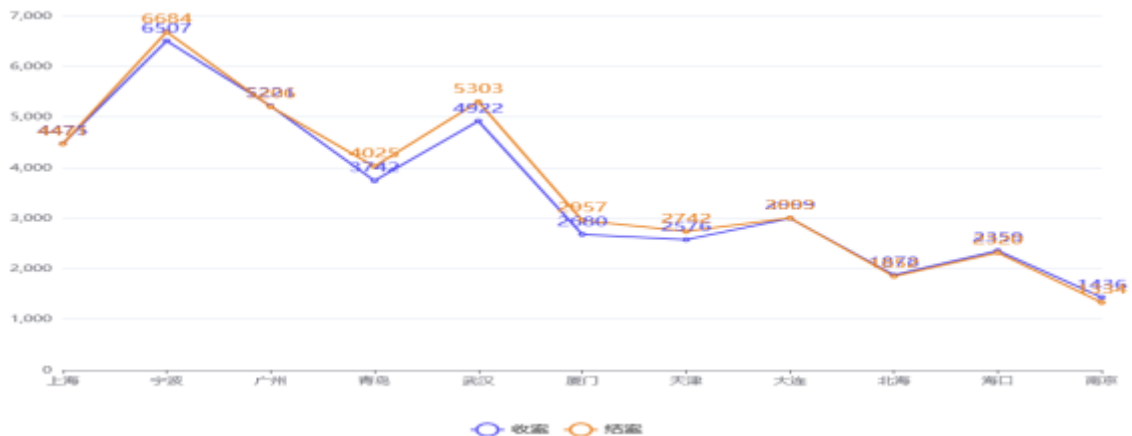
(四) 扣押、拍卖船舶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十一家海事法院扣押船舶 2717 艘，其中外籍船舶 105 艘，港澳台籍船舶 24 艘。拍卖船舶 1252 艘，其中外籍船舶 30 艘，港澳台籍船舶 9 艘。被扣押外籍船舶数量前五的船旗国依次为俄罗斯、巴拿马、利比里亚、马绍尔群岛、越南。被拍卖外籍船舶数量前五的船旗国依次为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伯利兹、新加坡。

(五) 执行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十一家海事法院受理海事执行案件 38795 件，结案 39897 件。

附表五：2018—2021 年全国海事执行案件收结案对比一览表



二、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助力建设海洋强国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事审判直接服务于外贸航运、海洋开发，事关国家司法主权、海洋权益，肩负着服务保障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主动服务和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有力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大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为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

（一）坚持科学谋划，服务保障国家战略

为充分发挥海事审判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深化顶层设计、鼓励对接地方，自 2018 年至 2021 年，先后出台《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支持和保障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文件，指导海事审判各级法院提高司法效能、创新审判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海事司法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提升、

上海全球枢纽港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浦东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各地海事法院结合各自区位优势，主动对接当地海事司法新需求，制定相应的实施意见，就海事司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发布情况通报及典型案例，各项务实举措成效突出。

（二）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海事法院对我国管辖海域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我海洋权益。2018 年 5 月，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陈某某、詹某某诉阿利兹航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公开宣判，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该案是我国海事法院受理的第二起发生在钓鱼岛海域的案件，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持续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辖。2020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海口海事法院作为海事刑事案件管辖试点法院，审理外籍渔民文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海口海事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公开宣判，以被告人文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处驱逐出境，没收作案工具和非法所得，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和生态评估费用。被告人文某表示服判不上诉。该案系发生在南海的外籍人员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进行水产品捕捞的海事刑事案件，是我国海事司法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对我国管辖海域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典型案例，凸显了海事司法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海事法院创新保障海洋权益的机制体系，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海口海事法院出台《海上巡回法庭及岛屿审判点工作制度》，成立海上巡回法庭，开展海上巡回审判和法治宣传。同时，在西沙晋卿岛挂牌成立岛屿审判点，在三沙法庭驻地永兴岛开展常态化轮值办公。海事法院在我国管辖海域以多种形式加大海事司法管辖力度，彰显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态度、责任和担当。

（三）加大海洋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根本要求和基础保障，迫切需要不断加大海洋环境司法保护力度，为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与保障。海事司法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之一，积极探索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实践，构建守护碧海蓝天的有力司法防线。

不断完善配套规则体系。2018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该类诉讼的性质、索赔主体，完善损失认定的一般规则与替代方法，对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全面加强海洋环境司法保护发挥重要作用。2020 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厘清了该类纠纷的案件管辖、责任限制、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的抗辩及赔偿范围等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加入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精神，为保护海洋环境提供了有力依据。海事司法实践中明确的裁判规则丰富和发展了海洋生态环境司法规则体系。海口海事法院审理的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通过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的珊瑚、砗磲依法予以同等保护，维护三沙海域生态环境安全。北海海事法院审理的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案，明确了非法围填海的主体、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及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规则，对于维护国家海岸线安全、维系海域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上述两案均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 31 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确立了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和裁判方法。

有序开展专业化审判实践。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不断强化海洋环境司法的专业化审判机制，确保案件的高质量审理，加大海洋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在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 2008-1 有限公司（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td）、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 CGM SA）、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Rockwell Shipping Limited）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再审案中，厘清了有关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调整边界，明确了船舶碰撞事故中非漏油船一方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及其相关的责任限制与责任限制基金分配规则，合理平衡了主权国家海洋环境利益与航运经营者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中国海洋生态司法保护的专业化水平。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巴拿马籍“正利洛杉矶（APL LOS ANGELES）”轮燃油泄漏导致海洋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邀请生态环境技术专家参与调解，发挥专业人士作用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将案件的受理情况和调解协议内容予以公告，保障了公众对海洋环境治理的参与和监督。海口海事法院审理首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责令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限期履职，履行了有效督促行政部门依法履职，保护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职责。海口海事法院发布海洋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8-2020），总结海洋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经验，提炼相关法律问题及解决建议，打造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亮点品牌。上海海事法院组建海洋环境保护专业审判团队，聘任专家陪审员和特邀咨询员，设置专业鉴定机构名录，不断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专业化的审判实践，为确保海洋环境审判的高水准、高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立高效司法保护合作机制。各海事法院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理念，唱好“大合唱”，打造海洋生态司法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广州、海口、北海海事法院共建共享海洋环保司法合作平台，打造“北部湾—琼州海峡”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朋友圈”，借助线上调解、线下协同工作模式，成功跨域调解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天津、大连、青岛海事法院签署框架协议，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开展渤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调联动和深度合作。各海事法院积极参加当地党委领导或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会商机制，加强与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北海海事法院与海事局、海警局、海洋局等建立沟通会商、信息共享、工作交流机制，共同维护北部湾海洋生态环境和海域安全。

（四）深入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紧紧围绕服务对外开放与海洋开发利用、外贸与航运经济发展、国际与地区航运中心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强化精品审判意识，全面提升海事审判公信力和影响力，拓展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维护航运商贸秩序。一是依法审结涉及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船舶碰撞等各类海事案件，保障航运安全，维护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稳定，引导航运市场规范有序健康运行，服务航运经济发展。厦门海事法院在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与复兴航运有限公司（REVIVAL SHIPPING CO., LTD）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明确货物等级和品质指标不属于承运人提单批注义务的范围，为海运实务操作提供指引，维护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性，保障交易安全和资金融通。宁波海事法院在蒋某某与林某某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准确解读船员无证驾驶与船舶所有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关系，对进一步规范水上交通秩序、维护船舶航行安全具有积极意义。武汉海事法院审理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润航船务有限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判决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对造成的养殖设施和珍稀鱼类物种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加强船舶经营管理、维护长江航行秩序、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大连海事法院灵活运用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加速疫情期间滞港集装箱及所载货物的流转，将船货双方的损失降至最低，促成海上货物运输、国际贸易和生产加工等一系列合同的顺利履行，为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强大助力。二是加强对船舶修造、航运融资、航运保险等涉船舶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案件的审理，促进海事金融产业活跃增长，推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助力优化航运发展软环境。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启东市顺丰远洋渔业公司与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件，综合双方当事人履约情况，准确认定违约责任，在国家

大力推进远洋渔业发展背景下，对妥善化解因履行周期长、变更次数多、涉及金额高而引发的类似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支持远洋渔业规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厦门海事法院审结标的额 1.4 亿元的厦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实现海事担保物权纠纷案，单个案件标的额创年度新高。天津海事法院于 2018 年发布《船舶融资租赁案件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做好相关法律问题解读和风险提示，积极为海事金融改革创新保驾护航。2021 年 5 月上海海事法院发布中英文《服务保障船舶产业发展审判情况通报》，梳理相关工作举措、问题建议和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为推动船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挥的重要作用。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一是依法审理港口作业、码头建设、港口疏浚等纠纷，助力沿海沿江港口转型升级、推动港口资源优化整合，服务和保障门户港建设。北海海事法院审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准确把握众多涉案方的利益诉求，依法认定各方责任，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充分体现了海事审判对港航新基建和海洋开发的支持，为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南京、天津等海事法院紧密关注港口航运领域新科技发展动态，及时出台绿色港口、智慧港口建设服务保障措施，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提供司法助力。宁波海事法院于 2020 年发布《港口码头等水域工程建设纠纷审判情况报告》，结合纠纷特点提出精准法律建议，为深化实施涉海涉港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打造浙江省“一体两翼多联”港口发展格局提供司法服务保障。二是妥善审理涉及海洋工程、邮轮旅游、海洋开发利用等案件，发挥海事司法在化解海洋经济矛盾纠纷、促进海洋经济要素运行方面的重要职能作用，促进海洋的科学开发利用，为海洋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司法支持。厦门海事法院圆满审结以总投资近 50 亿元的海上风电场工程施工养殖损害赔偿纠纷等为代表的一批海洋工程、海洋新产业和新业态案件，为助力我国海洋工程设备创新、保障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青岛海事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我国首个全潜式深海养殖装备“深蓝一号”建造合同纠纷案，合理划分双方的责任、确定损失的数额，既注意保护出资方的合法权益，也注意保护研制建造单位的创新积极性，并积极探索判后调解模式，促成双方当事人在判决基础上达成和解并自动履行完毕，成为保障国产深远海渔业规模化养殖成功，助力我国海洋网箱养殖规模化和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新类型典型案例。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羊某某与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我国加入的《1974 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作出裁判，为推进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实力建设持续升级提供司法指引。被告在判决后不仅及时履行赔偿义务，还针对判决认定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该案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商法数据库收录。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依法行使管辖权，恪守国际条约义务，尊重意思自治，准确适用准据法，妥善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不断提高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司法护航作用。厦门海事法院在益利船务有限公司与施某某等光船租赁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中，认定非对称管辖权条款（Asymmetric Jurisdiction Clause）有效，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符合国际商事海事交往的发展趋势和实践需求。南京海事法院在审理挪威籍船东 BOA BARGES AS 与南京奕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中，双方当事人主动协商变更原先的伦敦仲裁和适用英国法的约定，选择在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并适用中国法，法院用时 27 天化解持续 5 年的纠纷，展示海事司法的中国速度。青岛海事法院在依法扣押马绍尔群岛籍“尼莉莎（M/V NERISSA）”轮案中，外方当事人放弃伦敦仲裁，在法院促成下达成和解协议，新船东特意将船舶更名为“尊重（Respect）”，致敬中国法治。上海海事法院准确适用英国判例法审理胜船海事公司（Winship Maritime Inc.）船舶建造佣金合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实现准确适用外国法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中外国判例法的查明与适用提供了实践样本，该案例刊载于英国知名出版社 INFORMA PLC. 出版的《中国海事商事法律报告》（《Chinese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Reports》）并收录于其电子数据库。朝鲜籍船舶“秃鲁峰 3（TU RU BONG 3）”轮与韩国籍货船“海霓（HIGHNY）”轮在非我国管辖海域发生碰撞，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由上海海事法院行使管辖权并适用中国法。该案以及宁波、海口等海事法院审理的多起国际海事纠纷均系与中国没有连结点的外方当事人主动选择在中国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体现了对我国海事司法的信任，彰显了海事审判服务国家对外开放，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取得显著成效。

（五）维护船员合法权益，促进航运业健康稳定发展

依法维护船员合法权益，对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航运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涉船员纠纷的船员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居间合同等不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及解决路径、船舶优先权、船员工资报酬的法律保护等问题作出规定，并在 2020 年 6 月 25 日“世界海员日”来临之际发布维护船员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8 件，涉及船舶优先权的具体认定、人身损害赔偿消除城乡差别、保护垫付费用第三方取得的船舶优先权等法律问题，体现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弥补立法缺位以及法规、规章规定较为原则的不足，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彰显了海事司法对维护船员合法权益，规范引导船员市场和航运市场秩序，促进船员服务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各海事法院创新司法举措，全方位保护船员合法权益。一是制定船员人身损害纠纷、劳务纠纷简案快审操作规程，开通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保、快审、快执”，缩短船员合法权益实现的周期。二是构建“诉前联动纠纷解决”机制，与政府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快速高效化解纠纷。三是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积极申请司法救助金，保证疫情防控期间因案致困致贫船员维持基本生活。四是为国际船员的遣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利比里亚籍“狮子（Sam Lion）”轮、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希腊籍“天使力量（Angelic Power）”轮等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各海事法院在依法扣押拍卖外轮过程中，安全、高效遣返外籍船员，赢得外国外交机构和外方当事人的高度评价，为妥善处置疫情期间全球性海员遣返难题、帮助航运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中国方案”。五是大连、厦门等海事法院专门发布涉船员纠纷审判情况专项报告，通报基本情况、工作亮点、审判观点和意见建议，延伸海事司法服务，不断提升船员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促进了航运业的良性发展。

三、持续强化审判体系和能力建设，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继续向亚太地区和我国转移。海事司法是国际航运中心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航运贸易持续增长为海事审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提升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是紧迫的现实需求、历史的必然选择以及大国的应有担当。

（一）完善涉海法律体系建设，提供海事审判制度保障

随着航运贸易实践的发展、相关法律的修改，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很多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特色鲜明、科学合理的海事法律制度迫在眉睫。2018 年 9 月，修改海商法作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第二类项目，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立法项目。该项工作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深度参与海商法修法工作，组织全国资深海事法官进行研讨，结合审判实践提出修改意见，为海商法的修订贡献司法实践智慧。2019 年 7 月，为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海事诉讼制度体系，推进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工作专班，针对修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 2021 年 11 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关于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报告》，推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改纳入立法规划，并对重点修改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该报告得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充分肯定，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科学总结海事诉讼 30 多年司法实践的成效和经验，与时俱

进将海事诉讼法律制度逐步打造成为世界海事诉讼立法蓝本，向国际社会传播我国先进成熟的海事立法及司法经验的信心和决心。

2019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 A. P. 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 (A. P. Moller-Maersk A/S)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 (Archangelos Investments E. N. E.) “加百利 (Archangelos Gabriel)” 轮海难救助案和阿斯特克有限公司 (ASTKCO., LTD)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 21 批指导性案例。2019 年 12 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吕某某等 79 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第 24 批指导性案例。海事指导性案例归纳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规则，积极回应海事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但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或者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则，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指导和参照。

2020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运输合同、船舶建造、涉船员纠纷等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稳定中外当事人合理预期。该指导意见被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法系统收录。2021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涉及运输合同、船舶物权等海事案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涉外案件送达、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出规定，统一裁判尺度，成为全国海事审判实践的指南。自 2018 年-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发布年度典型案例 41 件，充分展现了海事审判在提升海事司法理念、统一裁判尺度、提高诉讼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完善和丰富新类型案件裁判规则，不断提升海事司法影响力和公信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创新工作制度机制，完善海事审判体系

海事司法体系布局不断优化。为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对海事司法资源进行重要调整，2019 年新设南京海事法院。为提供更便利的诉讼条件，武汉海事法院新设芜湖法庭，上海海事法院新设长兴岛法庭，宁波海事法院新设宁波自贸试验区法庭、筹备设立杭州法庭。海事法院派出法庭积极融入当地的国际与区域性航运中心、自贸试验区、“蓝色经济区”、中外工业园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充分肯定。目前，全国 11 个海事法院共设立 42 个派出法庭和多个巡回审判点，以适应海事法院管辖区域线长面广的特点，增强海事审判的服务保障能力，极大方便了当事人诉讼。

海事行政诉讼审理机制更加成熟。海事行政审判支持监督海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行政执法尺度统一，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对助力涉海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改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宁波海事法院审理不服行政机关对“三无”船舶的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件，体现了海事司法为依法开展海上执法活动，维护海运秩序，保护海上人命、财产和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提供的有力支持和监督。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福建省泉州海丝船舶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诉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件，对规制、监督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违法行政行为，促进涉海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天津海事法院审理天津至臻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疆海事局、天津海事局行政处罚案件，对规范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和运输具有良好指引作用。各地海事法院注重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府院良性联动机制不断完善。宁波海事法院与浙江省司法厅联合设立浙江省海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海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成效明显。大连、天津、厦门、宁波等海事法院发布海事行政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从司法角度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合理建议。

海事刑事案件试点稳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有序推进海事法院试点管辖海事刑事案件，继 2017 年 2 月指定宁波海事法院试点管辖海事刑事案件之后，又指定海口海事法院试点受理了两件被告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并授权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海口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特定类型海事刑事案件。宁波、海口海事法院作为海事刑事案件管辖试点法院，积极与侦查、公诉机关建立协作工作机制，加强海事刑事案件的程序衔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海上刑事案件个案指定管辖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规范对海事刑事案件的移送、起诉等程序。宁波海事法院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协作配合推动海事审判与海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纪要》，并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下持续加强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的协作共商，探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三）推进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提升司法服务水平。2019 年 8 月 30 日，全国海事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跨域立案，当事人可在全国任一海事法院立案窗口办理所有海事法院的立案手续。各地海事法院还陆续实现跨域材料转递、跨域卷宗查阅、跨域领取文书等诉讼服务功能，通过互联网为中外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南、案件查询等服务，彻底打破管辖区域的地理限制。各海事法院持续深入渔村、码头等边远地区开展巡回办案、纠纷调处和法律宣传，打通海事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与港航、商贸企业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了解司法需求，提供司法服务，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海事司法影响力和辐射力显著提升。上海、南京、武汉、宁波海事法院积极回应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司法需求和司法关切，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跨域司法协作，共同打造海事法院司法合作标杆示范。为提升涉外审判便利化程度，上海海事法院探索推广海事诉讼代理概括性授权司法认可机制，认可境外当事人授权我国境内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其在我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诉讼案件进行代理，化解因办理授权委托公证认证手续导致涉外案件审判周期过长的的问题，极大提升办案效率。10 个海事法院设立英文门户网站，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海事司法的声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涉外海事审判配备同声传译室，实现庭审的多语种同声传译；厦门海事法院为部分民事裁判文书提供英文参考译本；上海海事法院推出中英文双语海事诉讼指南；广州、宁波等海事法院为外国当事人提供多语言诉讼服务。海事法院多语种应用走在中国法院的前列，在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便利的同时，用海内外看得到、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海事司法故事，增强海事司法的国际传播力。

推动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各海事法院坚持源头化解，靠前服务，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大力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形成矛盾纠纷化解的“多车道”。南京海事法院在案源多发地设立水上交通事故、港口、涉渔纠纷一站式解纷中心，倡导诉前化解案件。天津海事法院设立京津冀货运代理纠纷调解中心，精准服务海运货运代理行业。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多家海事法院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建立海事案件委托仲裁调解机制，上海海事法院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共同发布《海事案件委托调解白皮书》，充分发挥仲裁机构的优势，纠纷化解成功率不断上升。大连海事法院在院本部和派出法庭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以优质高效的解纷服务助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青岛海事法院与荣成海洋与渔业局、潍坊渔业协会等单位就诉前调解、渔船燃油补贴等事项达成协议，畅通诉调对接渠道。宁波海事法院发布海上枫桥经验白皮书，及时总结推广经验。海事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特色突出，收获累累成果。

增强海事司法透明度。各海事法院积极拓展司法公开渠道，增强公开效果，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海事司法机制。自 2018 年至 2021 年，各海事法院连续发布中英文年度海事审判白皮书、专题审判报告 55 件，涉及海事法院全面工作，以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碰撞、船舶共有、海洋渔业、海事执行等多个法律专题，全方位多角度公开审判执行数据、工作亮点、问题建议和典型案例等，在全国法院系统独具特色，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海事司法，不断提升透明度，扩大国内国际影响力。2020 年大连海事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实现审判流程有效公开率均居所在省中级法院第 1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持续关注中国海事法院司法公开状况，连续发布中国海事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对海事法院典型案例发布、外文网站建设等司法公开化举措给予积极评价。

（四）注重强化队伍建设，增强海事司法能力

加强培训调研。一是强化实务培训。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定期开展海事审判实务培训和进行针对性授课指导，提升海事审判队伍整体业务能力。二是开展法治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先后在上海海事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州海事法院设立的国际海事司法基地的作用，密切关注海事司法理论和实务前沿热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调查研究，切实增强司法调研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助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三是深化学术研讨。各海事法院积极设立各类学术交流平台，鼓励审判人员提升学术研究能力。由宁波、广州、厦门海事法院先后承办的全国海事审判研讨会，紧贴国家发展战略和海事审判实务工作需要开展研讨，不断推动海事审判理论研究走深走实。广州海事法院举办的广州海法论坛、武汉海事法院依托长江海商法学会举办的学会年会等平台已初步成为规格较高、全国知名的海事海商法研讨学术盛会。海事法官活跃在中国海法高端论坛、东亚海法论坛、各地海商法学会研究会年会上，为各类海事海商学术研究贡献智慧，展示海事法官的风采。不断强化的培训调研，为提升海事审判水平和能力，打造高素质的海事审判专业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

扩大国际交流。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与来自巴西、俄罗斯、新加坡、南非等 21 个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代表，围绕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问题、新冠疫情下船员权益的保护等海事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广泛凝聚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有力促进与会各方在司法领域的互学互鉴与交流合作。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派员积极参与《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草案》（北京草案）的制定，为推动草案的公约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从海事法院选拔优秀人才参加中英、中法、中新、中非等多个国际法治论坛、研讨活动以及可转让多式联运单证法律问题研究等国际会议，更多中国法官登上国际舞台，诠释中国法治经验，为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广州海事法院和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东亚海法论坛”，为海事法官提供与来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的海商法学者、海事律师和航运界人士交流的平台。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海事法律、熟悉国际航运实务的复合型海事审判专业队伍创造了实践平台。

（五）强化现代科技支撑，提升海事审判信息化水平

建设全新中国海事审判网。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划“中国海事审判网”，打造一体化智能平台，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广州海事法院承建。网站并存中、英文两种界面，设置内外网两个平台，覆盖全国 11 家海事法院及其上诉审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海事审判业务，面向中外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线上庭审、云端执行等在线诉讼服务，打造全能化数字海事诉讼新模式；面向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发布权威海事司法信息、展示海事司法成就，拓展海事司法的公众传播力；面向海事法官提供辅助办案、科学管理的智慧支撑，满足海事审判工作需求。网站打通、链接、融合人民法院各类信息化平台，通过信息共建共享共用，实现“智服、智宣、智审、智管”多重功能，推动海事审判与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促进提升海事审判智能化水平。网站设置的 The Voice of Judge（法官说法）、船舶扣押拍卖、船舶数据分析系统、船舶评估系统、海事司法案例库等具有海事特色的栏目和功能，对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提升海事审判质效、展示海事审判成就、提高海事司法影响力、推动海事审判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智慧海事法院特色化发展。各地海事法院依托信息化、大数据科技成果，积极开发各具特色的审判辅助工具，提升海事审判信息化水平。广州海事法院开发的“船舶评估系统”，通过根据船舶价值评估方法构建系统数据模型，可以快速、准确地免费评估船舶价值，为当事人节省传统评估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为案件调解、船舶拍卖提供绿色、环保、低碳的专业数据参考。上海海事法院开发的“船货港数据一体化智能辅助系统”，具备船舶实时查询、轨迹查询、船舶碰撞模拟和船舶预警追踪四大功能，通过大数据为海上侵权纠纷的碰撞事实、碰撞紧迫局面成因等提供智能化分析，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信息化支撑。宁波海事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浙江基地打造的海事司法案例库，系全国首个深度融合海事法律专业知识服务+案例大数据智推的互联网海事法律服务平台。截至 2021 年底，案例库的海事裁判栏目收录 122115 条裁判文书数据，涵盖海事法官办案所需的各类海事专业数据资源，为类案、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可靠保障，有助于规范法官裁量权、统一裁判尺度。海事审判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面推进，司法与数字科技融合，线下诉讼与线上诉讼融合，推动了诉讼模式变革。疫情期间，各海事法院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有效克服疫情对正常诉讼活动的影响，切实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全方位全流程“无接触式”在线诉讼服务，实现“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科技赋能海事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后 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强海事司法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向海图强，奋发有为，努力为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可持续海洋生态环境、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滴水穿石，涓流成河。中国海事审判，正沿着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参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航道加速前行。

附录：

一、2018-2021 年期间发布、修订的涉海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0）11 号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6）10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8）7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9）1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法释（2010）11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1）14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2）3 号	2020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二、2018-2021 年期间发布的海事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

指导性案例		
案例编号	案例名称	发布时间
指导案例 108 号	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 A. P. 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9 年 2 月 25 日
指导案例 110 号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2019 年 2 月 25 日
指导案例 112 号	阿斯特克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2019 年 2 月 25 日
指导案例 127 号	吕金奎等 79 人诉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9 年 12 月 26 日
指导案例 177 号	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	2021 年 12 月 1 日
指导案例 178 号	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案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18 年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	生效案号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Mitsui Sumitomo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诉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	(2018) 沪民终 140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岚山支行与天津西南海运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8) 浙民终 624 号
曲某某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岛支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2017) 最高法民再 413 号
中燃航运 (大连)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2017) 辽 72 民特 104 号
韩某某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2018) 最高法民再 453 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江苏华隆海运有限公司、宋某某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8) 鄂民终 1376 号
江门市浩银贸易有限公司与联泰物流 (Union Logistics, Inc)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6) 粤 72 民初 311 号
陈某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公司等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	(2018) 津民终 392 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18) 沪民终 81 号
申请执行人福安市海洋与渔业局与被执行人陈忠义等海事行政非诉执行案	(2018) 闽 72 行审 6 号

2019 年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	生效案号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 2008-1 有限公司 (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td)、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 (CMA CGM SA)、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 (Rockwell Shipping Limited) 海难救助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8) 最高法民再 368 号
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诉大连丰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8) 最高法民申 6289 号
深圳市恒通海船务有限公司与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	(2019) 最高法民申 3906、3907 号
中化国际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诉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	(2019) 最高法民申 3187 号
海宁富兴塑膜有限公司诉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顺翔船务代理 (深圳) 有限公司、太平船务 (英国) 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9) 浙民终 422 号
朝鲜豆满江船舶会社 (Korea Tumangang Shipping Company) 诉 C. S. 海运株式会社 (C. S. MARINE CO., LTD) 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8) 沪民终 504 号
天际国际集团公司 (Skyline International Corp.) 申请扣押 “尼莉莎” 轮 (M/V NERISSA) 案	(2019) 鲁 72 财保 108 号
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诉光汇宝石油轮有限公司 (BRIGHTOIL GEM TANKER LTD.) 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9) 琼 72 民初 22 号
福建省泉州海丝船舶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诉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	(2019) 闽行终 159 号
陈某某诉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行政处罚与行政赔偿案	(2018) 浙行终 1135 号
天津至臻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疆海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行政处罚案	(2019) 津行终 30 号

2020 年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	生效案号
莆田市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与加斯佩罗船贸有限公司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2019)闽 72 民初 969 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扬州润航船务有限公司、成某某、朱某某、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船舶触碰责任纠纷案	(2018)鄂 72 民初 102 号
李某某、林某某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	(2020)琼民终 431 号
益利船务有限公司与施某某等光船租赁担保合同纠纷案	(2020)闽民辖终 114 号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与 SPV 萨姆莱恩有限公司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0)鲁 72 民初 1845 号
BOA BARGES AS 与南京奕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2020)苏 72 民初 611 号
蒋某某与林某某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9)浙 72 民初 1036 号
福建省中江石化有限公司与利比里亚籍“GAS PRODIGY”轮船舶所有人等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2020)闽 72 财保 2 号
樊某某、郭某某与黄某某、周某某、罗某某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2020)粤 72 民初 89 号
胜船海事公司与中海工业有限公司、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佣金合同纠纷案	(2019)沪 72 民初 2560 号

2021 年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	生效案号
文某（VAN）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2020）琼 72 刑初 1 号
陶某某不服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2021）沪 72 行初 1 号
中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台州海警局、浙江海警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2020）浙行终 1766 号
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与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养殖设备建造合同纠纷案	（2021）鲁民终 861 号
大连凯洋食品有限公司等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2021）辽 72 行保 16 号
马士基有限公司（Maersk A/S）与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2021）闽 72 民初 165 号
通德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系列执行案件	（2020）苏 72 执 106 号等 10 案
东盛航运有限公司（ORIENTAL PRIME SHIPPING CO., LIMITED）与商行荣耀国际航运有限公司（HONG GLORY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2020）沪 72 协外认 1 号
天津轮驳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	（2021）辽民他 280 号
“天使力量”（Angelic Power）轮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2021）粤 72 民初 956 号等 15 案

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编号	案例名称
1	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绿色通道 促进邮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梁某某等诉钻石国际邮轮公司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2	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 支持机构协助船员维权 ——海隆公司诉荣耀公司船舶优先权纠纷案
3	船员横遭弃船孤悬海外 法院高效维权助力归家 ——利比里亚籍“奥维乐蒙（Avlemon）”轮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4	统一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维护遇难船员家属权益 ——利比里亚籍“FS SANAGA”轮与“浙三渔 00011”轮碰撞引发的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系列案
5	公正高效司法 合理保障我国船员海外务工的劳动权益 ——骆某某等与阮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6	防范串谋诉讼 “夫妻船”共债共担 ——杨某某与方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7	劳务报酬应支付 履约损失另主张 ——匡某诉许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8	工资数额约定不明 依据同期市场标准确定 ——王某某诉被告钟某某、王某贵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2022 年 12 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报告

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发布时间：2023-01-06

本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延续调整行情，运输需求低位徘徊，供求失衡情况未能改善，综合指数继续下行。随着年末中国开始优化防疫政策，未来市场将呈现稳中向好的局面。12 月，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1358.63 点，较上月平均下跌 19.3%；反映即期市场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指数平均值为 1129.48 点，较上月平均下跌 18.7%。

1、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继续增长，船舶租赁行情继续回落

①我国开始优化防疫政策，各主要港口均保持正常运营。2022 年 11 月，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沿海和内河港口吞吐量走势出现分化，其中沿海港口吞吐量继续上涨，内河港口吞吐量则出现回落。据统计，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567 万 TEU，较去年同期上涨 6.2%。其中，沿海规模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271 万 TEU，同比上涨 7.5%；内河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95 万 TEU，同比下跌 3.3%。

②由于近期集运市场运价出现较大幅度调整，拖累集装箱租船市场行情同样出现回落，部分船型租赁价格跌幅较大。据克拉克森统计，2022 年 12 月份，2750TEU、4400TEU、6800TEU、9000TEU 船舶租金较上月下跌 5.8%、5.4%、20.9%、11.7%。

2、欧地运价继续下行

欧地航线，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0 月零售销售月率环比下跌 1.8%，为 2021 年 12 月以来最大降幅。由于欧洲地区能源价格因俄乌冲突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导致通胀水平居高不下，近期多项制造业数据均低于荣枯线，需求持续下滑，经济面临陷入衰退的风险。本月，运输需求表现疲软，供求关系未有改善，市场运价继续下行走势。12 月，中国出口至欧洲、地中海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1936.20 点、2274.02 点，较上月平均分别下跌 25.5%、16.6%。

3、北美行情持续调整

北美航线，据供应链管理协会（ISM）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 ISM 制造业指数降至 49，低于前值及市场预期，这是该指数在过去六个月中第五次下滑，同时也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跌破 50 这一荣枯分水岭。由于通胀继续处于高位，美联储还将采取加息及缩表等紧缩措施，经济将失去宽松政策的支持，未来的前景不容乐观。今年传统运输旺季，北美航线出口市场总体呈现旺季不旺的局面，运输需求徘徊在低位，本月市场运价继续调整态势。12 月，中国出口至美西、美东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898.74 点、1455.28 点，分别较上月平均下跌 17.1%、20.3%。

4、澳新市场延续下跌

澳新航线，当地市场对各类生活物资的需求缺乏进一步增长的动力，运输需求处在较低水平，供需基本面不佳，本月市场运价延续下行走势。12 月，中国出口至澳新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1328.31 点，较上月平均下跌 22.5%。

5、南美运价大幅下跌

南美航线，目的地国家经济基础较弱，通胀水平高企，在美联储连续加息期间，经济风险较大。运输需求增长乏力，供求平衡情况不理想，本月市场运价有较大幅度的下跌。12 月，中国出口至南美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717.24 点，较上月平均下跌 37.4%。

6、日本市场小幅下行

日本航线，运输需求基本稳定，市场运价小幅下跌。12 月，中国出口至日本航线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1100.82 点，较上月平均下跌 3.9%。

民航局印发《航空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指南》

来源：中国民航局 发布时间：2023-01-10

近日，为落实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固化机制”的要求，民航局印发《航空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总结推广疫情以来民航行业的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切实提高航空物流保通保畅服务保障能力。

《指南》在总结主要机场和航空公司保通保畅工作经验基础上编制而成，适用于行业相关单位和各市场主体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航空物流保通保畅相关工作，旨在推动民航业内交流学习，切实提高航空物流服务保障能力；推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突发事件应对和应急响应航空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性保障作用，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指南》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安全可靠”“坚持系统思维，加强统筹协调”“鼓励先行先试，强化创新驱动”等基本原则，通过“建机制、优流程、强措施”，从八大方面明确机场、航空公司等市场主体推动保通保畅工作的主要方向和关键路径，包括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运力调度与保障、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完善集疏运体系、优化通关环境、加强信

息化建设、建立“绿色通道”和“白名单”、做好政策宣贯和舆论引导等。《指南》还系统总结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广州白云等机场，以及国货航、南货航、东航物流、顺丰航等航空公司的经验做法，通过全行业推广，着力推动应急举措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典型案例

2022 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3-01-19

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评选的 2022 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今天推出。此次入选的十个商事案件，均为 2022 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

这十个案件分别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诉大唐系企业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巩义市嘉成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胡兴瑞诉王刚买卖合同纠纷案，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诉张钜标等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张亚红诉陶军男、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卫龙武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与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隆鑫系十七家公司重整案。

这十个案件展示了过去一年中，人民法院在商事审判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平等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优化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司法服务和保障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谢鸿飞，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啸，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慈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尹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曙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德风应邀为上述 2022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商事案件进行了精彩点评。

一、化解民营企业特大债务风险，完善金融纠纷案件集约化专业化审理机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诉大唐系企业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

1. 案情简介

2018 年 4 月，盾安集团及 87 家子公司爆发债务危机，浙江高院和杭州中院共受理盾安系案件 868 件，涉诉金额合计 243 亿余元。为有效解决全国各地债权人分散诉讼、分散保全、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利局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盾安系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其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人就其与盾安集团下属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大唐系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先后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共 50 余件，诉讼标的高达 29.48 亿元。杭州中院受理该批案件后，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引”“疏”“调”并举，既防止债权人挤兑式诉讼，又避免盾安系企业消极应诉，先后就 50 余起应收账款质权纠纷案件进行调解或作出判决：一、应收账款质权人对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在大唐系企业处的应收账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大唐系企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应收账款质权人支付应收账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驳回应收账款质权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2. 专家点评（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为适应处置化解特定金融风险的需要，各地法院在处理涉诉规模较大的金融纠纷案件时往往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采取指定集中管辖的措施。本系列案是在民营债务企业处置中适用集中管辖的案件，体现了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

集中管辖有利于提高审判质效，集约化、专业化、高效化解决企业特大债务危机，最大程度避免和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该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的处置，充分展示了集中管辖带来的制度赋能。首先是诉讼程序集约化。在该系列案处理中，鉴于案涉质权人及债务人基本一致，而次债务人则分散于全国各地这一情况，法院基于集约化处理原则，采用多案联审等方式集中开庭审理，并多次组织质权人以及涉诉企业跨地区、多层级相关人员进行联合调解，减少沟通环节，最终实现应收账款质权纠纷调解比例达 38%，达到纠纷实质化解、企业风险排除的良好效果。其次是裁判尺度统一化。在集中管辖模式下，法院得以充分掌握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及相关基础买卖合同引起的索赔纠纷、涉诉企业其他债权人提起的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等诉讼案件信息，全面协调处理应收账款质权优先权、债权人代位权以及次债务人大唐系企业享有的索赔权等权利；通过衔接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兼顾质权人利益和次债务人权益的保障，有效实现了实质公平。再次是信息对接畅通化。法院积极保持与债务人及债委会、执委会开展高频度信息对接，实时追踪企业“瘦身”自救方案及落实情况，有效保障盾安系企业合力配置资源、开展正常经营；针对涉诉企业债务涉及的金融机构、上下游企业和供货商数量多，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情况，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保障案件妥善处理。最后是该系列案处理的专业化。该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系列案涉案主体众多、权利利益冲突巨大，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且所涉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挑战性强，尤其是关于债权查封是否影响案涉质权的有效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否以质押登记为准、应收账款质权人是否有权要求次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等争议问题，专业性强，法院依据法律、遵循法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在该系列案处置过程中，法院强化底线意识、法治思维、系统观念，会同金融机构、属地政府全力帮助集团纾困重建。一方面，从有效帮扶企业生存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集中管辖优势，持续加大案件调解力度，因案施策，根据涉稳、涉众风险点，逐案制定最优工作方案，避免了大型企业失控而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注重统筹化解矛盾，有效保护权利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形成较强示范效应，为安全规范、井然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依法高效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为担保将来订立本约而交付的定金，因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导致本约未能订立，定金不再退还

——巩义市嘉成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18 年 7 月，巩义市人民政府（乙方）与义煤集团（甲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经报省政府同意，为置换保留铁生沟煤矿，双方约定由巩义市政府下属的嘉成能源公司收购大有能源公司下属铁生沟煤矿有效资产和铁路专用线资产；嘉成能源公司支付 4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如果未能收购成功，且甲方亦未与其他第三方达成该项资产的交易，则上述定金不再退还。后嘉成能源公司分期交纳了 4000 万元，大有能源公司向嘉成能源公司出具收据，注明“铁生沟矿转让定金肆仟万元整”。经大有能源公司委托，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出具转让资产的三份资产评估报告，分别涉及铁生沟煤业的股权、铁路专用线和债权，并在上述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制订了《资产转让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经省国

资委备案。2019 年 11 月 12 日大有能源公司通过中原产权公司，将案涉转让标的公开挂牌出让，所发布的《国有产权转让公告》明确意向受让方要接受并认可《资产转让的实施方案》的内容，并对铁生沟煤业偿还转让方的剩余债务和担保作出相应的承诺。挂牌出让期内均，无意向受让方进场摘牌。2019 年 11 月 25 日，嘉成能源公司总经理向大有能源公司董事会秘书发送《担保方案》，提出了用铁生沟煤业的采矿权、机器设备、构筑物及其他总价值共 4.492 亿元的财产向义煤集团及大有能源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但此意见与之前大有能源公司在《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及承诺函要求的债务担保主体及方式不一致。2020 年 3 月 27 日，巩义市接收铁生沟煤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义煤集团发出《关于巩义铁生沟煤业移交接收工作安排的函》，提到未能摘牌的原因是：资金受银行政策影响，资金没有准备到位，并承诺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将报名摘牌所需的保证金 1.2 亿元足额存入公司账户上，并建议义煤集团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开始对铁生沟煤业产权及资产再次进行挂牌。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5 月 24 日大有能源公司通过中原产权公司，将案涉转让标的二次公开挂牌出让，挂牌出让期内均无意向受让方进场摘牌，案涉资产未能交易成功。后铁生沟煤矿被关闭。嘉成能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大有能源公司返还定金 4000 万元及利息。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作出（2021）豫 01 民初 1201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嘉成能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嘉成能源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高院判决认为：《转让协议》是具有预约性质的合同，案涉定金为订约定金，只要本约未能订立不是由于出让方的原因，则该定金就不再退回。嘉成能源公司在是否对铁生沟煤业的债务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问题上，出现意见反复，最终影响了其进场交易的意愿，导致未能正式签约，收购未能成功，因此案涉收购未能成功签约是嘉成能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鸣创能源公司自身原因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之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专家点评（谢鸿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实践中以预订书、订购书、意向书、备忘录、初步协议、框架协议、战略协议、原则性协议等形式存在的预约合同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股权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商品房买卖、大型设备采购、租赁、民间借贷等复杂交易领域。《合同法》并未规定预约合同，但为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预约合同纠纷案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就预约合同作了明确规定。此外，《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五条还就商品房买卖中立约定金的法律适用作了明确规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在吸收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

预约合同制度，肯定预约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回应了实践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较于本约合同，预约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司法实践对于预约合同的认定、违反预约合同的认定以及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问题均存在一定争议。为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解释（征求意见稿）》用 3 个条款规定了预约合同，并对立约定金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规定。

在本案中，终审判决认为，判断案涉协议是否为预约合同，要根据协议的名称、约定的内容尤其是约束力条款，后续的履行情况、是否交付定金等情况，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合同解释方法，综合审查分析，以探究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当事人在案涉转让协议中为担保将来订立正式合同设置了定金条款，则该定金具有立约定金的性质。这对于预约合同的认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本案也可以看出，立约定金在性质上其实就是预约合同的违约金。因此，是否适用定金罚则，就要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违反预约合同。一般认为，在预约合同生效后，如果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本约合同或者在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本约合同的，就应认定该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在本案中，预约合同生效后，受让方在明确知晓本约合同担保条款内容的情况下，又在提供担保的主体及担保方式问题上出现意见反复，以致未能进场交易并与出让人订立正式的资产转让协议，从而构成违约。据此，终审判决认为，因本约合同未能订立是可归责于交付定金一方的原因，故约定的定金不再退还。这对于违反预约合同的认定以及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疑难问题的处理，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国家发布明确禁止“挖矿”活动的监管政策后，当事人签订的比特币“矿机”买卖合同应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

——胡兴瑞诉王刚买卖合同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21 年 10 月 18 日，胡兴瑞与王刚通过微信方式达成买卖协议：胡兴瑞向王刚购买三台神马 M20S 型机器，又名“矿机”，特指在网络上挖比特币的专用计算机设备。2021 年 10 月 19 日，胡兴瑞通过微信、支付宝向王刚转款共计 62220 元。当天，胡兴瑞通过微信指定交货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高家村 4 组 45 号、收货人为唐彪，同时王刚通过微信将上游卖家的货物快递单号发送给胡兴瑞。2021 年 10 月 23 日，胡兴瑞以微信电话方式欲告知王刚机器无法使用，但最终没有联系上王刚，胡兴瑞随即对机器进行了拆机检查。2021 年 10 月 24 日，胡兴瑞联系上王刚后将机器的测试视频、SN 码及设备照片发送给王刚，要求协商处理。

2021 年 10 月 25 日之后，胡兴瑞无法再联系上王刚。胡兴瑞遂诉请解除合同并返还设备款。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就“矿机”买卖形成的合同无效，设备款和设备由双方互相返还。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 专家点评（程啸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围绕比特币生产、交易等经济活动及其上下游、衍生业务活动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财产及相关经济活动，虽然监管部门近年来发布多份文件予以规制，但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导致司法实务中对此类纠纷的裁判标准有所不一。2021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 10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述通知表明，对于事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事关金融安全的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国家采取严格监管态度。市场主体如有违反，相关交易合同的效力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给予否定性评价，并对各方权利义务作出妥善处理。

本案纠纷产生于比特币生产的上游“矿机”买卖环节，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在 2021 年 9 月前述通知发布之后。审理法院对案涉买卖合同作出无效的认定，体现了人民法院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司法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一，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比特币不具有与我国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挖矿”活动产出的“成果”不是法定货币，也没有实际的价值支撑，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经营失败、投资炒作等多重风险突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秩序，甚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所以，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禁止开展和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本案从比特币交易活动对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的影响出发，对相关交易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将潜在的金融风险尽量化解在风险链条的前端，传达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司法态度。

第二，本案也是对《民法典》规定的生态文明原则的有力贯彻。《民法典》确立了生态文明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司法审判应当对该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体现进行判断和引导，从个案中分析相关民事活动对资源、环境

的危害程度、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无损害等。本案中，买卖合同以“挖矿”为目的，而“挖矿”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对电力资源造成巨量浪费的同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符，与公共利益相悖，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

第三，本案对于对各类市场主体起到很好的价值引领和提示警醒作用。本案的判决，能够提示和引导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大众，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既应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亦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念，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提示广大投资者，要自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活动风险，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四、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16 年 12 月，房某某、梁某某与南京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科新浚）、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新创）签订协议约定，高科新浚、高科新创认购绍兴闰康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闰康）新增出资 1 亿元，而绍兴闰康是作为江苏硕世的股东之一，对江苏硕世进行股权投资。此后，各方签订《修订合伙人协议》，其中 4.2 条上市后回售权约定：在江苏硕世完成合格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届满之日，投资方有权要求任一回售义务人（房某某、梁某某或绍兴闰康）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其全部或部分合伙份额对应的收益权；上市后回售价款以按发出回售通知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江苏硕世股份在二级市场收盘价算术平均值作为计算依据。

2019 年 12 月，江苏硕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十条规定，前述 4.2 条约定属于发行人在申报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前应予以清理的对赌协议。但江苏硕世在申报发行过程中，未按监管要求对回购条款予以披露和清理。2020 年 7 月 13 日，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向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发出《回售通知书》，要求绍兴闰康履行上市后回购义务。当日，江苏硕世盘中的股票交易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价 476.76 元。此前 30 个交易日，江苏硕世的股票价格涨幅达 155%。次日起江苏硕世股价一直处于跌势，直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交易收盘价为 183.80 元。因房某某、梁

某某、绍兴闰康未于高科新浚发出回售通知后 3 个月内支付相应回购价款。高科新浚遂提起本案诉讼：1. 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共同向高科新浚支付合伙份额的回售价款 499023228.60 元；2. 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共同向高科新浚赔偿因逾期支付回售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3. 判令绍兴闰康协助高科新浚办理绍兴闰康所持江苏硕世 204.0995 万股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在前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办结后或逾期未在法院判决限定期限内办理股份质押手续的，高科新浚可通过协议折价或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房某某、梁某某、绍兴闰康应向高科新浚支付的回售价款及利息损失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上市后回售权的约定违反金融监管秩序，判决驳回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全部诉讼请求。高科新浚、高科新创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修订合伙人协议》系绍兴闰康的合伙人之间签订，但房某某、梁某某系江苏硕世的实际控制人，高科新浚、高科新创借合伙形式，实质上与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不仅变相架空了禁售期的限制规定，更是对二级市场投资人的不公平对待，有操纵股票价格的风险，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应认定无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专家点评（李建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证券监管和金融司法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全国法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坚持协同治理，司法理念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向而行，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资本市场稳定有序、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2022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无效。本案正是人民法院对上市公司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作出的示范性裁判。涉案上市后回购股权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还涉及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维护和金融安全稳定等问题。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对违反证券监管规则的行为效力作出妥当的司法认定，以使金融政策实现完善金融市场治理的使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核规则，系争回购条款属于江苏硕世股票发行上市前应当披露，且应予以及时清理的对赌协议。《证券法》将发行上市审核权和规则制定权授权给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审核规则的效力层级虽然下降，但依然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强制力。一方面是因为在实质层面上，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

规制，保障广大投资者准确评估证券价值和风险，维护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乃是这些规则设置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形式层面上，低级规范的创造由高级规范决定，高级规范又由更为高级的规范决定，监管规则与上位阶规范同属于法律规范等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效裁判参照 2019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31 条精神，充分考察证券监管规则背后所保护的法益实质，对系争回购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涉案回购条款约定的价格完全按照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计算，已经背离了估值调整协议中“估值补偿”的基本属性，且从回购通知前后江苏硕世股票价格走势来看，不排除存在人为操纵股价的可能。上述与二级市场股票市值直接挂钩的回购条款约定，扰乱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和金融安全稳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条款。二是形成司法裁判与证券监管的协同互动，实现优势互补，并以此提升金融市场风险治理的绩效。本案当事人均是专业投资人，在目标公司发行上市申报期间隐瞒了涉案回购条款，违规获取上市发行资格。对于上述故意规避监管的违规行为，司法裁判应与金融监管同频共振，坚决予以遏制，否则将助长市场主体通过抽屉协议或设立马甲公司等隐蔽手段规避证券监管，侵蚀注册制以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为核心的制度根基。本案裁判受到证券市场广泛关注，也得到了广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良好反响。本案通过司法裁判对规避证券监管要求的行为给与否定评价，不仅提高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避免违法者因违法而不当获益，而且还能充分发挥金融司法与证券监管不同的功能优势，提升金融市场的治理实效。尤其在当前 IPO 注册制背景下，对保障证券监管要求不被架空，维护金融系统安全，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

——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诉张钜标等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八源公司是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股东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出资额 31 万元、10 万元、9 万元，均应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前缴足。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八源公司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报告均记载，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各股东认缴的出资均已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全部实缴。但八源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该公司基本账户 1994 年 10 月

收到 50 万元后，短短几日内就几乎被现金支取完毕，八源公司及各股东均未能解释现金支取原因及用途。

2015 年 9 月 15 日，八源公司制定新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 万元，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 62 万元、20 万元、18 万元，出资期限均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八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记载，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分别认缴的上述出资，均已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实缴。

2017 年 12 月 20 日，张钜标将其股权分别转让与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同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四人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填报的《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信息记录表》（非公示信息）中均确认，八源公司实收资本 0 元。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以八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终结本次执行案件有多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八源公司欠付兴艺公司货款未偿还，兴艺公司起诉，请求判决八源公司偿还欠款及逾期利息；八源公司股东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对张钜标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一、二审判决判令八源公司向兴艺公司偿还欠款及利息，但驳回了兴艺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公示年报信息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各股东对于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的实缴出资信息应当知晓而未依法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为其明知且认可年报信息。债权人对于公示信息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法应当予以保护，虽然八源公司股东新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但兴艺公司主张应按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实缴出资时间作为出资期限，依据充分。因此，张钜标、颜经纬、黄润林各自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八源公司欠兴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各股东未缴出资的利息起算点，应按八源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确定。颜经纬、黄润林、任永强明知张钜标未出资而受让其债权，应在各自受让股权占张钜标出让股权的比例范围内对张钜标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再审判决遂对股东的责任方面进行了改判：对八源公司债务，判令张钜标、黄润林、颜经纬分别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向兴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 50% 的利息自 2014 年 9 月 22 日起算，另 50% 利息自 2015 年 5 月 18 日起算。对于张钜标的补充赔偿责任，任永强、颜经纬、黄润林分别在对应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如张钜标、黄润

林、颜经纬、任永强已因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对八源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了补充赔偿责任，应当予以扣减。

2. 专家点评(朱慈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案中，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判决股东以其同意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自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起算。以此平衡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公信力，保护并促进交易。

本案判决的重大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二是彰显了公司登记的重大意义。

就股东出资义务而言，众所周知是以股东设立公司或者加盟公司时的承诺为准，即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但是，本案中股东们通过工商登记系统将认缴的出资登记为已缴，即登记为出资已实缴，并通过公示系统对外彰显，产生了公示效力，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方对该公示产生了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应按公示的时间认定。本案法院的裁判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特别值得赞赏。

就公司登记而言，此次公司法修订将公司登记专列一章，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是构建新型市场监管体制，强化信用监管，推动商事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其意义深远，也备受关注。国务院于 2014 年出台《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范企业信息公示制度，通过强化企业信用约束手段，提高信用监管效能。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企业及股东，违反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使之不能正常发挥展示企业基本信息、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信用风险的作用，扰乱了市场秩序。本案中，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误导社会公众及交易相对方，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股东以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法院裁判具有一定开创性和规则意义，有利于司法审判与行政监管、社会监督形成合力，强化企业信用约束，营造公平、合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也将节省社会资源，极大提升社会管理效能。

六、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的期货居间人和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的期货公司应对投资者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张亚红诉陶军男、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张亚红（原告）通过居间人陶军男在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并受到损失，认为陶军男和首创期货公司均存在过错造成其损失，遂将陶军男和首创期货公司诉至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陶军男、首创期货公司向张亚红连带赔偿损失 772717 元。陶军男、首创期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陶军男向张亚红赔偿损失 579537.83 元，首创期货公司向张亚红赔偿损失 193179.28 元。裁判理由为：作为期货居间人的陶军男应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同时对投资者应当负有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义务。陶军男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导致张亚红在对期货投资的高风险认知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了投资，增加了张亚红经济损失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且高风险随后被现实化。同时，陶军男因为张亚红的交易而获取高额比例的居间报酬。陶军男对于张亚红期货交易损失的发生具有较大的主观过错，该过错与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陶军男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虽然首创期货公司的履约行为对于张亚红期货交易损失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首创期货公司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导致期货居间人陶军男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因此，首创期货公司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亚红作为一位有金融产品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级别与其所交易的期货产品风险等级相适配。张亚红的损失发生直接源于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并与张亚红采取的操作方式相关。张亚红对期货投资的高风险不作充分分析判断，对他人指定的期货居间人陶军男的身份未向首创期货公司进行核实，后发生期货交易损失。故虽然陶军男及首创期货公司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对张亚红期货交易结果的同一损害，但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且期货居间人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经纪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结合张亚红、陶军男及首创期货公司存在的过错、过错的性质及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酌定陶军男赔偿张亚红损失的 30%，首创期货公司赔偿张亚红损失的 10%。

2. 专家点评（叶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期货交易者可以直接委托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也可以借助居间人或者中介人的居间服务。委托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公司和经纪人在向交易者提供服务中，应当分别或者共同向交易者承担交易者适当性义务。期货居间人应当接受期货公司的管理，期货居间人对交易者承担适当性义务，并不免除期货公司对交易者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反之亦然。期货公司和期货居间人违反交易者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往往相互交织，需要甄别交易者与期货居间人或者期货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个案情况，交易者可以要求期货居间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期货公司承担责任，有时还可要求经纪人和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在处理中，清晰界定了交易者与居间人和期货公司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分别认定了居间人和期货公司对交易者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夯实了案件处理的法理基础。

在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中，期货居间人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期货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期货居间人接受期货公司委托，作为期货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媒介，能够帮助期货公司展业，也能够帮助交易者尽快熟悉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者与期货公司的交易成本，提高双方的缔约成功率。然而，我国针对期货居间服务缺少专门规定，期货市场居间服务监管不够完善，在实践中时常出现因期货居间人行为不规范引发的各类民事纠纷。本案即自然人作为期货居间人，因期货公司对期货居间人疏于管理，导致期货居间人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违反期货居间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进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民事案件，具有典型性。

针对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未做出明确规定，刚刚颁布实施的《期货和衍生品法》也未做出规定，需要结合民事基本法、既往裁判和行业做法等做出妥当裁判。本案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期货居间人的含义做出界定，明确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及期货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特别是，作为自然人的居间人，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应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居间业务，并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等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在划分交易者、期货居间人和期货公司的法律责任时，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的性质及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确定。本案特别强调，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之间相对独立，但并非“绝对隔离”，可以参照《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判断期货公司是否履行了对期货居间人的管理责任。期货公司具有一定过错的，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该案在期货居间人法律地位的认定、期货公司合规经营的准则、期货交易者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遵守法律、符合法理的重要解释，填补了期货居间服务规则不明的漏洞，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同时，本案审理结果参考《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等期货行业惯例，有助于督促期货公司更好地履行对期货经纪人的管理职责，提高期货居间服务的水平，对今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时，未按照客观谨慎、忠实客户原则履行义务，存在未履行风险揭示义务、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等欺诈投资者行为，应根据过错程度，对投资者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卫龙武诉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北京中方信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信富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质。2020 年 7 月，原告卫龙武通过“今日头条”广告推荐得知中方信富公司，向中方信富公司支付 5800 元购买荐股软件，后支付 368000 元咨询服务费升级为会员。8 月 17 日，中方信富公司向卫龙武邮寄《中方信富财务管理中心服务协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风险揭示书》，卫龙武以协议内容并非双方原来商量的全部内容为由拒绝签字。2020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中方信富公司员工梁长元、王军勇以“主力资金”内幕消息诱导卫龙武进行证券交易，明确建议卫龙武购买两只股票，并多次要求卫龙武按其指示操作，承诺卫龙武翻倍收益，最终卫龙武亏损 573397.57 元。卫龙武向深圳证监局举报中方信富公司深圳分公司，中方信富公司退还卫龙武 368000 元、5800 元。2021 年 3 月 11 日，深圳证监局在向卫龙武的书面答复中认为，中方信富深圳分公司存在未完成风险揭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程序且未签约即收费，提供投资顾问性质服务未签署投资顾问协议，服务留痕不全等问题。卫龙武以中方信富公司违规行为导致其损失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方信富公司赔偿其损失 573397.57 元及利息。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卫龙武的全部诉讼请求。卫龙武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中方信富公司未履行风险提示义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程序，存在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虚假宣传、代客户作出交易决策等违反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定的欺诈投资者行为，应赔偿卫龙武因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同时，卫龙武亦对自身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结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中方信富公司对卫龙武的投资损失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方信富公司赔偿卫龙武投资损失 401378.30 元。

2. 专家点评（冯果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属性，依法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投资建议服务，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体现该法在修订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要求、规范证券服务机构履职、加强投资者保护等理念，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精神，明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以及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定，实施欺诈投资者行为的法律后果，判决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赔偿，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督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尽责归位，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公平以交易主体的理性判断为前提，本案判决亦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警示教育功能，即在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对于盲目相信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虚假宣传，意图通过该方式获得远超理性投资的不当高额收益等违背证券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的行为，司法裁判认定投资者应自行承担相应部分损失。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者均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增强资本市场活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司法裁判较好地实现了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责任划分，充分彰显了司法审判的引导示范功能。一方面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投资建议服务，引导树立客观谨慎、忠实客户的行业规范，压实证券投资服务机构责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引导投资者强化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减少非理性投机行为，从司法层面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从投机型市场向投资型市场转型，助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八、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与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20 年 4 月 4 日，青岛日联华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联华波公司）仓库起火。火灾造成该公司和青岛牧野车辆装备有限公司、青岛优锐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锐塑胶公司）、青岛德迈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迈迪医疗公司）、青岛牧野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野模具公司）财物毁损。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4 日 15 时 40 分许；起火部位位于日联华波公司二楼北侧仓库内；起火原

因排除人为纵火，排除物品自燃，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日联华波公司、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均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处投有财产综合保险，约定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代他人保管的财产；（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分别与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日联华波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并向除日联华波公司之外的三家公司依约赔偿了保险金。日联华波公司与优锐塑胶公司、德迈迪医疗公司、牧野模具公司（以下简称该三家公司）因存在部分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致等情形构成关联公司。原告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起诉日联华波公司，要求在对该三家公司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该三家公司对日联华波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日联华波公司抗辩称，其与该三家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情形，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无权向其行使追偿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人保财险青岛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日联华波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日联华波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该三家公司）的关联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同一性，在法律人格上亦不具有依附性，故其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在对该三家公司赔偿保险金后，对日联华波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

2. 专家点评（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保险具有分散风险和消化损失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功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正常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稳压器”，是各类市场主体安心干事创业的有力支撑，对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发挥着重要服务功能。

本案涉及的保险人代位求偿制度派生于对财产保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保险法基本原则——损失补偿原则。这一制度有利于弥补保险人的财力，实现保险业的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引导各类主体依法依规行事，遏制财产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侵权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可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和第三者处重复受偿而获得不当得利。

对于《保险法》第六十二条有关“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的理解，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历来存在争议。就“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有人认为主要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代理人、信托人等，有人则认为主要指与被保险人之间适用免赔规则的执行董事或其他法定代表人等。但无论如何，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旨在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而无法实际获得损失补偿，从而导致保险制度损失填补基本功能的落空。因此，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相对人之间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同一性”，应当是确定“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具体范围的基本依据。本案法院判决立足于对被保险人与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法律地位的分析，指出其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即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利益，关联公司之间对于不属其所有的财产也并非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从法律上将被保险人的法定利益与其关联公司的法定利益予以切割，据此认定本案被保险人的关联公司不构成《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保险人可依法对该关联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这一认定，完全符合保险法相关条款的立法目的，对实务中同类或相似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保险法》第六十二条在司法裁判中的妥当解释和适用，树立了正确的范本。

九、当事人一方依据合同主要条款主张权利，对方以合同履行与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不一致抗辩的，应以实际履行行为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深圳市衣支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支米公司）讷河新恒阳生化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阳公司）于 2016 年 7 月签订《销售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新恒阳公司授权衣支米公司为广东地区的独家销售代理商。新恒阳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衣支米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新恒阳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578,456.53 元，但经管理人审查未予确认，遂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给付奖励的条件为广东地区独家销售代理并禁止跨区窜货，但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改变了销售模式及销售地域的约定，在此种情况下，是否仍应给付奖励及如何奖励，双方应进一步协商确定，但未有证据证明对奖励条款重新约定。另外，根据历次对账函显示，衣支米公司均欠新恒阳公司大额货款，如存在奖励，衣支米公司理应就此奖励金额主张抵扣欠款，但在对账过程中双方从未涉及奖励事宜。王红旗既是衣支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曾是新恒阳公司

的职工，对新恒阳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应为明知，如存在奖励，其未及时申报债权亦不符合常理。从新恒阳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向衣支米公司发出的询征函的提示内容看，双方已对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债权债务结算完毕并予以确认，也进一步说明案涉《销售代理合同》未实际履行，亦不存在新的奖励条款的约定。故对衣支米公司要求确认其对新恒阳公司享有债权 578,456.53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 专家点评（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领域，即每个重要的破产案件都有大量的衍生诉讼，这些案件处理不好，会极大影响破产法实施的效果，加大破产程序的司法成本，甚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破产衍生诉讼在破产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重视破产衍生诉讼，不仅能够促使破产程序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还能有效维护债权人、债务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内部之间的利益平衡，化解各相关利益主体的矛盾与纠纷，实现破产法所追求的公平清偿和集体清偿价值。

本案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是破产衍生诉讼中较多发生的一类案件，破产债权确认是破产制度中为妥善解决对有异议债权的实体争议而设置的司法审查确认程序。破产债权确认诉讼作为破产程序中债权确认环节重要的法定异议处理程序，对于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权利保护至关重要，它对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真实性以及债权人表决权的确认具有实际意义。

本案紧紧围绕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的实质，以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基础，结合实际履行情况、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判断。本案债权确认程序的正确适用，不仅避免了债务人财产的流失及债权人最终可受偿利益的不当减损，而且保证了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最终保护了债务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东北经济正处于全面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攻坚阶段，高效办理破产案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而聚焦妥善办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则是办理好破产案件的重要抓手。本案在办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中，以平等维护各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衍生诉讼的实体价值与程序意义，注重其对整个破产程序司法审理专业性与权威性的影响，注重法治思维与市场化思维的运用，既有助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办理好破产案件，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帮助困境企业脱困重生，实现市场出清、民生保障、企业救治，助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依法准确办理破产衍生诉讼，为促进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服务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助推东北振兴迈上更高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十、综合运用预重整、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解决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难题

——隆鑫系十七家公司重整案

1. 案情简介

隆鑫系企业包含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两个子系，其中隆鑫集团下属隆鑫控股连续多年入选中国 500 强企业。隆鑫系企业已发展成覆盖摩托车制造、环保、汽车销售、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多元化产业集团，资产涉及 A 股和 H 股三家上市公司控制股权，两家上市公司参股权以及境外公司股权。受多重因素影响，企业自 2018 年起逐渐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受隆鑫集团控股，是重庆知名汽车经销商集团，受关联担保影响亦陷入债务危机。2021 年 9 月 29 日，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分别申请重整并同时申请预重整。重庆五中法院对预重整及预重整辅助机构进行备案登记，预重整辅助机构指导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与债权人开展协商谈判，制作重组协议，招募投资人。2021 年 11 月 16 日，债权人重庆车生缘商贸有限公司分别申请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重整。2022 年 1 月 30 日，重庆五中法院依法分别受理隆鑫集团等十三家公司重整，并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裁定该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2022 年 3 月 10 日，重庆五中法院依法分别受理金菱集团等四家公司重整，并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裁定该四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法院对于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的重整进行协调审理，一体化推进。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的重整涉及利益主体多、考量因素多，内容复杂。法院在预重整阶段采取“弱介入”，充分发挥私力脱困程序的灵活性，充分发挥庭外重组阶段的市场化功能。预重整辅助机构指导债务人与债权人、出资人、投资人开展大量谈判协商，汇聚各方意见形成的重组协议和投资协议通过了市场化筛选。进入重整程序后，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及法院裁定批准，以重组协议为基础制定的重整计划具备了司法权威性。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内部构架复杂。隆鑫系企业下属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两个子系内部高度混同，但两系之间的资产和营业关联度弱。由于两子系债务严重关联，均无法单独成功重整，因此对两子系分别实质合并重整，同时对两子系的关联债务处理、出资人权益调整等进行协调审理，从而整体化解了企业债务。

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重整投资人招募普遍面临投资金额大、单一产业投资人无法应对多元化产业的难题。重整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潜，全面真实披露信息，吸引投资人参与竞争。选择具有不同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基金投资人与西部成渝地区产业投资人组成投资联合体，充分发挥基金投资人募集和管理资金的能力与产业投资人产业背景优势，各施其长、相互配合，解决了多元化产业需求的匹配难题。

“庭外重组+重整”和“实质合并+协调审理”的灵活运用，诠释了如何综合运用破产制度，充分借助市场力量，解决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重整难题。隆鑫系企业重整，整体化解了企业债务 420 多亿元，维护了 7 万余户中小投资者、2000 余名职工的合法利益，保障了上下游产业链千余家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实现了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稳定的目标。重整还推动了企业生产更新换代，在全国率先开启电动车和电动摩托车的专项 IGBT 芯片设计，实现了企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注入“强心剂”。

2. 专家点评（许德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预重整是在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两种制度的基础上融合创新而产生的一种企业挽救辅助性模式，不仅具有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化解争议等实际效果，还具有鼓励当事人自治与市场化协商、积极及早自救、自动自觉遵循法治的良好社会导向。预重整的有效实施既离不开充分的市场化运作，也离不开有效的法治化约束。本案中，在庭外重整阶段，法院采取“弱介入”的方式，充分发挥庭外重组的市场化脱困功能，让企业与各方主体进行市场化商业谈判，通过市场化筛选形成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防止庭外重组沦为司法重整的庭外延伸。同时，法院也为预重整提供合法性和方向性指引，实现了庭外重组和司法重整的有效衔接。也正是由于市场化与法治化的有效结合，吸引了基金和产业投资人结合自身优势，形成合力，较好解决了多元化投资需求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集团和关联企业的存在已是常态，为了解决上述企业破产中存在的问题，2018 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关联企业破产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实质合并和协调审理适用标准，谨慎确定实质合并企业的范围，妥善把握协调审理的程序节奏，为重整计划的制定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案中，隆鑫集团相关企业和金菱集团相关企业能够形成各自的重组方案和投资方案，但是两个子系之间关联债务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债权人和投资人都会止步不前。本案两个子系的重整计划对关联债务的清偿做了协调，消减了关联债权人和投资人的疑虑；对招募投资人的进度做了协

调，推动了重整计划同步形成；对主要程序节点进行协调，两个子系的重整相互促进，最终一体化推进重整成功。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维护和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隆鑫系企业重整案为人民法院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探索一条拯救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特别鸣谢：上海市律师协会